

全球对话

13.3

GLOBAL DIALOGUE

一年出版3期,以多种语言刊出

与 Rita Segato 谈社会学

Breno Bringel
Vitória Gonzalez

熠熠生辉的 ISA

Margaret Archer
Michel Wieviorka
Michael Burawoy
Margaret Abraham
Sari Hanafi
Geoffrey Pleyers
Martin Albrow

批判理论视角中的世界 (反之亦然)

Stephan Lessenich
Gurminder K. Bhambra
Manuela Boatcă
Patricia Cipollitti Rodríguez
Bruna de la Torre de C. Lima
Esteban Torres

减碳化与绿色殖民主义

Breno Bringel
Maristella Svampa
Hamza Hamouchène
Nnimmo Bassey
South-South Manifesto

理论观点

Kathya Araujo

议题开讲

- > 「恐惧政治」与威权政治想像
- > 以水运动抵抗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

MAGAZINE



International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isa

第13卷 / 第3期 / 2023.12

GD



> 主编的话

在本期的第一篇文章中，我们访谈了知名学者／运动者 Rita Segato。访谈过程里，我们谈到了他在性别、暴力、殖民主义等领域的贡献，也讨论到如何将南方的南方以及全球的视野与前述议题结合。Segato 也分享他对当代议题的观点，例如威权主义的挫败以及女性主义运动的国际化。

Izabela Barlinska 担任本会的执行秘书40年，期间有许多贡献，如今终于退休。于是ISA本期有幸能新增一个专栏，其中收录了五位前主席 (Margaret Archer、Michel Wieviorka、Michael Burawoy、Margaret Abraham、Sari Hanafi) 以及刚于 Melbourne 上任的现任主席 (Geoffrey Pleyers)，对 Barlinska 致上的敬意。在这份专栏中，我们也将刊出 Pleyers 在第二十届世界社会学大会的就职演讲。悲伤的消息是，Margaret Archer 刚刚辞世，Martin Albrow 也在专栏中向其致意。

除此之外，本刊还有另外两个专题。首先，是由 Stephan Lessenich 和 Estaban Torres 组织的「批判理论视角中的世界(反之亦然)」，时逢社会学研所 (IfS) 成立一百周年，他们将在专题中总结当前的批判理论。在这六篇文章当中，作者们从不同观点重新检视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包含：它与全球社会学的关系 (Stephan Lessenich)、后殖民主义 (Gurminder K. Bhambra)、去殖民主义批判 (Patricia Cipollitti Rodríguez)、边缘经验的全球化 (Manuela Boatcă)、文化产业 (Bruna de la Torre de Carvalho Lima)，以及提倡世界社会的新批判理论 (Esteban Torres)。

社会现象背后，是存在着全球交织性的。在「减碳与绿色殖民主义」此一专题中，作者们也秉持着这样的观点，探讨霸权生态主义转型对于全球南方的

影响。Bringel 和 Svampa 认为，一种以气候和环境问题为中心的新资本主义共识正在成形，他们将其称为「减碳共识」。运动家 Hamza Hamouchène 和 Nnimmo Bassey 则分别从北非和泛非的角度，分析全球北方能源转型所派生的绿色殖民主义。最后，我们也将刊出由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的运动家、知识分子及组织共同撰写的《正义与大众生态社会转型——南方的南方宣言》。

「理论对话」中，智利社会学家 Kathya Araujo 呼吁，有必要重新审视威权(与威权主义)理论。他回顾了一些较为经典的理论模型，指出他们如何因社会变迁而过时，并以互动与关系性方法为基础，提出一些分析威权的可能途径。

受 Araujo 的启发，Lara Sartorio 于「议题开讲」的首篇文章中，探讨恐惧政治如何为主体性构框，并形塑威权政治想像。此外，Madelaine Moore 则介绍著作《Water struggles as resistance to neoliberal capitalism》中的几项重要发现，透过水的政治与社会再生产理论进行对话。

至今，新的《全球对话》编辑团队已经运作了一年，我们期待未来能持续在不同的读者、文化、地方和知识传统之间建立桥樑。未来一年，将会有更多值得期待。别忘了，如果你喜欢这份刊物，也可以用你的母语协助我们推广。■

Breno Bringel, 《全球对话》编辑

> 全球對話以多種語言刊出，請至 [官網](#)。

> 投稿來信寄至：globaldialogue.isa@gmail.com

isa International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GLOBAL
DIALOGUE**



> 编辑团队

主编: Breno Bringel.

助理编辑: Vitória Gonzalez, Carolina Vestena.

副主编: Christopher Evans.

执行主编: Lola Busuttil, August Bagà.

顾问: Michael Burawoy, Brigitte Aulenbacher, Klaus Dörre.

顾问编辑:

Sari Hanafi, Geoffrey Pleyers, Filomin Gutierrez, Eloísa Martín, Sawako Shirahase, Izabela Barlinska, Tova Benski, Chih-Jou Jay Chen, Jan Fritz, Koichi Hasegawa, Hiroshi Ishida, Grace Khunou, Allison Loconto, Susan McDaniel, Elina Oinas, Laura Oso Casas, Bandana Purkayastha, Rhoda Reddock, Mounir Saidani, Ayse Saktanber, Celi Scalón, Nazanin Shahrokni.

各国编辑

阿拉伯世界: (黎巴嫩) Sari Hanafi, (突尼西亚) Fatima Radhouani.

阿根廷: Magdalena Lemus, Juan Parcio, Dante Marchisio.

孟加拉: Habibul Khondker, Khairul Chowdhury, Mohammad Jasim Uddin, Bijoy Krishna Banik, Abdur Rashid, Abu Ibrahim Huda, Mohammed Jahirul Islam, Sarker Sohel Rana, Eashrat Jahan Eyemoon, Helal Uddin, Yasmin Sultana, Saleh Al Mamun, Ekramul Kabir Rana, Farheen Akter Bhuiyan, Khadiza Khatun, Aysha Siddique Humaira, Arifur Rahaman, Istiaq Nur Muhit, Md. Shahin Aktar, Suraiya Akhter, Alamgir Kabir, Taslima Nasrin.

巴西: Fabrício Maciel, Andreza Galli, José Guirado Neto, Jéssica Mazzini Mendes, Ricardo Nóbrega.

法国/西班牙: Lola Busuttil.

印度: Rashmi Jain, Manish Yadav, Rakesh Rana.

伊朗: Reyhaneh Javadi, Niayesh Dolati, Elham Shushtarizade.

哈萨克: Aigul Zabirowa, Bayan Smagambet, Adil Rodionov, Almash Tlespayeva, Kuanysh Tel, Almagul Mussina, Aknur Imankul, Madiyar Aldiyarov.

波兰: Aleksandra Biernacka, Anna Turner, Joanna Bednarek, Marta Błaszczczyńska, Urszula Jarecka.

罗马尼亚: Raluca Popescu, Raisa-Gabriela Zamfirescu, George Bonea, Marina Dafta, Costin-Lucian Gheorghe, Alin Ionescu, Karina Ludu, Diana Moga, Ramona-Cătălina Năstase, Bianca Pințoiu-Mihăil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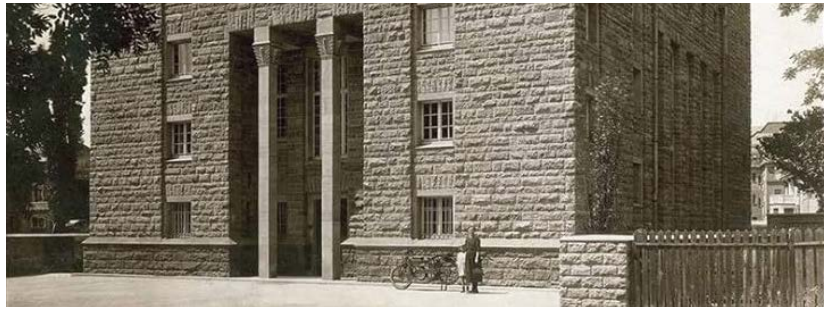
俄罗斯: Elena Zdravomyslova, Daria Kholodova.

臺灣: 李宛儒, 呂道詠, 黃翊碩, 簡芊楹, 賴奕璋, 林韻柔, 周芸瑄.

土耳其: Gül Çorbacıoğlu, Irmak Evren.



Rita Segato, 来自阿根廷的作家、人类学家、女性主义者, 关注殖民性等重要议题, 并致力于使全球南方的声音被听见。



社会研究所 (ISR) 迎来成立的第一百周年, 法兰克福学已有百年历史, 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反思历史和当代批判理论的机会。



如今, 生态社会转型已经是成为政治经济议程的核心焦点之一, 因此, 我们不能单单将其化约为能源转型或抵抗全球南北不平等。

封面圖片來源: iStock, 2021。



Global Dialogue 由 SAGE 贊助

> 目錄

主编的话 2

> 社会学对话

超越少数族群化与殖民化: Rita Segato 专访
Breno Bringel, 巴西/西班牙、Vitória Gonzalez, 巴西 5

> 熠熠生辉的 ISA

为ISA奉献的四十年: 向 Izabela Barlinska 致意
Margaret Archer, 英国、Michel Wieviorka, 法国、Michael Burawoy 和 Margaret Abraham, 美国、Sari Hanafi, 黎巴嫩、Geoffrey Pleyers, 比利时 8

全球社会学的四个转变
Geoffrey Pleyers, 比利时 12

向玛格丽特阿切尔(1943-2023)致上个人敬意
Martin Albrow, 英国 15

> 批判理论视角中的世界(反之亦然)

批判理论和全球社会学: 姐妹同盟?
Stephan Lessenich, 德国 16

棉花殖民主义: 资本主义的后殖民反思
Gurminder K. Bhambra, 英国 18

边缘逆写: 殖民经验的世界化
Manuela Boatcă, 德国 20

整体性与外部性: 去殖民批判理论的范畴
Patricia Cipollitti Rodríguez, 美国 22

文化工业: 批判理论的(政治)研究议程
Bruna Della Torre de Carvalho Lima, 德国/巴西 24

迈向全球社会的批判理论
Esteban Torres, 阿根廷 26

> 减碳化与绿色殖民主义

减碳共识
Breno Bringel, 巴西/西班牙, 以及 Maristella Svampa, 阿根廷 28

北非的能源转型: 殖民主义、剥夺与征用
Hamza Hamouchène, 英国/阿尔及利亚 32

非洲的绿色与内部殖民主义
Nnimmo Bassey, 奈及利亚 35

南南合作: 促进生态社会能源转型之宣言
多位作者共同撰写 38

> 理论观点

革新威权(与威权主义)理论的必要
Kathya Araujo, 智利 41

> 议题开讲

「恐惧政治」与威权政治想像
Lara Sartorio Gonçalves, 巴西 44

以水运动抗争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
Madelaine Moore, 德国 47

「全球社会学不该继续以西方大学为中心, 也不该以那些自诩为适用于世界各地的概念为尊, 并要跳脱这类对这种西方社会学的批判」

Geoffrey Pleyers

> 超越少数族群化与殖民化： Rita Segato 专访



来源: Beto Monteiro / Secom UnB

Rita Segato 是一位享誉盛名的阿根廷作家、人类学家和女性主义运动家。她是巴西利亚大学的名誉教授，近年来获得了将近十所欧洲、拉丁美洲大学颁发的荣誉博士学位，以及数个重要奖项，包括：加勒比哲学协会颁发的 Frantz Fanon 奖（2021年）、布宜诺斯艾利斯市议会颁发的文化杰出人物奖（2019年）等。此外，她还分别在圣马丁国立大学以及马德里的索菲亚王后博物馆，开设「不安定思想」Rita Segato 讲座以及 Aníbal Quijano 讲座。除了拥有杰出的学术生涯，在种族、民族、国家、宗教、性别、暴力和殖民多个领域皆有创新研究外，她也在人权领域有巨大贡献。例如，她是巴西第一个为了确保黑人和原住民学生能进

入高等教育，而和他人合作推出著作的人（1999年）；还和拉丁美洲的各种妇女组织合作，是妇女运动的重要人物。她最近以英语出版《[The Critique of Coloniality](#)》（Routledge, 2022）。2023年9月，Rita Segato 接受了全球对话编辑 **Breno Bringel** 和 **Vitória Gonzalez** 的采访邀约。

Breno Bringel 和 Vitória Gonzalez(BB&VG): 近年来,您的成就与学术生涯,已经在全世界受到肯定。然而,我们认为,来自世界各地如非洲、亚洲、中东甚至欧洲地区的读者,仍然需要进一步了解您的研究。您的研究贡献,以关注拉丁美洲居多,您认为这些贡献,与其他脉络的社会或现象如何关联?这些如何有助于推动以全球南方出发点的全球对话?

Rita Segato(RS):不幸的是,传播思想的主要枢纽仍然是美国。关于「什么事情值得关注?」这个问题的答案,很大程度都是经过了美国的过滤。学术界大多数人,都是透过这个经过全球北方筛选的视角,来决定什么著作比较值得阅读。简单来说,所有事物的验证过程都在那里完成,这本来就是帝国的任务之一。另一方面,关于思想传播这个主题,于全球南方已经有许多讨论。虽然有点抱歉,但我必须说,我是不相信自我限制这个说法的。我更倾向同意秘鲁思想家 Aníbal Quijano 的观点,他说,尽管来自南方,但他不只是在思考南方,也不只是为南方思考,而是为了世界思考。世界仍处于殖民结构当中,而思考并试图消解这种结构,也是一个涉及全球的问题。

至于我的学术工作,我希望能够和更多非洲、加勒比、亚洲和中东研究当代议题的学者见面。虽然我们尚未充分利用虚拟现实,其效果仍无法媲美实体的经验,不过这至少为实现这件事开启了一扇大门。不过,即使我们打算与前殖民地学者进行对话,我们还是得提醒自己,我们是为了这个世界,而进行思考和书写。你可以在我的少数化(minoritisation)批判著作中看到此观点。少数化指的,是由多元文化主义赋予「他者」(即具有完整主体性的任何本体,如女性、印第安人、黑人、不同性向的族群等)一个定义。

在我看来,我们必须破除这种对于政治少数的定义,即他们的行动与思考都是以自己为出发点。如果女性在倡议中取得了进展,那么当父权体制崩溃时,所有的权力结构也都被被动摇,而我们的对手非常清楚这点。这些倡议可能带来的潜在威胁,让他们试图走上街头抗议,并重复着毫无意义的口号,例如「性别」只是一种「意识形态」,而不是一个能够解释性别文化建构与多样性的分析工具。这些人出现在街头上,就证明了被低估的「少数群体」对于世界的既有结构带来了多大程度的威胁。

BB & VG:如果我们协助您将一篇作品翻译成我们刊物所涵盖的各国语言,您会推荐哪一篇?为什么?

RS: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对作者来说很难回答。我的一些文章探讨了父权压迫,另一些涉及种族压迫,

还有些探讨了「政治」和「政治性」的差异(主要是在批判政治受到国家掌控)。现在很多文章都以访谈和甚至是影片的形式传播。我越来越多用说话的方式来表达,写作则是越来越少了。这一方面是因为年纪大了,一方面是我更迫切地想被理解。

虽然这样说,不过,我的倒数第二本书里面有两篇比较不知名的文章:〈重建女性主义以重建政治〉和〈没有一个父权老板会发动革命:资本主义和父权的关系〉。这本书于2022年以葡萄牙文出版,叫《Cenas de um pensamento incômodo》,2023年则以西班牙文出版。我最新出版的著作的前言〈讚美不确定性〉言简意赅,很好地表达了我的观点。这本书于智利以西班牙文出版,名为《Expuesta a la muerte》。

还有一本书里面,有我后续思想的所有基础概念。虽然近年来有些作品已经或正在被翻译成英文、德文、法文、义大利文、葡萄牙文,甚至希腊文,但这本书并没有这么幸运。他叫做《Las estructuras elementales de la violencia》,其中的关键章节〈性别结构与强暴授权〉,是我后续所有思想的基础。

关于前面提到的多元文化主义批判,在我的书《La Nación y sus Otros》中,有几章特别在讲这件事情,尤其是章节〈政治身份/历史他者:批判全球多元主义的确定性〉。同样在那本书中,我预测了某种「政治」批评的出现,由于封闭于相似性质的网路中,其具有向心性、内向性、内生性、领域性。

BB & VG:您在过去的作品中,开创了许多有趣的、探索性别与殖民关系的方法。如今全球极右主义崛起,使得种族主义、殖民主义和性别暴力加剧,我们该如何应对这样的历史机制?

RS:第一个问题,是思考种族主义、父权与殖民之间的关联。另一个问题,是关于当代法西斯主义的形成。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的关键策略、方法或说结构,就是会将某些「他者」建构为敌人。法西斯主义需要借由塑造一个敌人、一个为其牺牲的受害者或代罪羔羊,来凝聚其权力及盟友。可以说,法西斯主义是借由「他者」的建构而形成的。因此,受到种族歧视的人、女性和性别异常者,特别容易成为「他者」的对象。形塑「社会的共同敌人」并不困难,「他者」在过去殖民结构的遗绪之下,早就已经被视为威胁。

BB & VG:多年以来,我们都认为像是阿根廷这样,经历了较多历史事件与人权运动的国家,可能会对威权主义更有抗性。然而如今,我们也能在阿根廷看到一股修正主义的潮流,甚至是否认主义。你如何看待这样的情况?

RS: 我们至少得将阿根廷政治生活的两个层面纳入考量。首先, 国家管理之于被管理的对象间的外部性: 自国家建立以来, 阿根廷的领土和人民, 都处在一种状态当中; 我将这种状态称为「根基错误」, 其确保管理的殖民性能够持续存在。其次, 是「政治」(politics) 与「政治性」(the political) 之间的距离。前者源自于国家结构的行动与决策、政党组织化的社会运动、其中的派系和利益, 以及它们典型的内生行动导向; 后者指的则是在社会中流动、编织社会关系, 并有效地引导历史。

阿根廷的右派选民, 追求的是在社会部门的引领下将政治「重启」, 并基于过去的历史, 主张领导者需要更公平地分配资源, 且认为政治只应该活跃于政党内部; 他们放弃了人民该持有的角色, 并将其视为需要被带领的群体。这种缺乏(或说被剥夺了)主动意识的情况催生了(尤其是)年轻人的恨意。除此之外, 还有一个信念, 是「如果不生活于在媒体的聚光灯之下, 你的生活就不够充实; 你就不存在」。在民主和现代性承诺从未被实现的情境下, 恨意只得不断地累积。

民主并非只是关于民主。现代性——平等, 有爱, 自由——也并不只是关于现代。这些累积的怨恨和失望情绪, 被反民主的政治势力所利用。导致阿根廷种族灭绝的人已经走进了正义与审判当中, 然而借此实现的「权利」如今似乎也遥不可及。现在, 这只是国家当局的业务, 而大多数人并不愿参与其中, 也不感觉自己在其中有所归属。

BB & VG: 现在还有所谓的女性主义国际吗?

RS: 国际的概念其实是很有趣的, 这指向的是一个跨越国界、社群、具有相同目标与抱负的女性主义。不过, 这种女性主义的潜在风险, 是我刚刚所提及的, 「人民」与「政治」之间的距离。由「专家」和保有传统观念的人组成的高峰会议, 可能会危害女性主义运动。女性主义运动应该是多元, 且以创造没有霸权的世界为目标的。由于欧洲中心的女性主义仍保有垂直主义, 非洲部分的女性主义运动者, 选择使用「妇女主义」(womanism) 来指称自身。两者背后有着不同的历史, 以及各自独特的性别结构脉络, 由这些差异而生的抗争和其目标也有所不同。唯有从这些差异之中, 找到两者共有的追求时, 女性主义国际才有意义。

BB & VG: 让我们最后再快速地问个问题: 你认为我们洲的原住民, 有没有什么地方是全球社会学可以学习的?

RS: 准确来说, 是那种不会在统治者和人民之间产生隔阂、能够保有对于多元世界的想像, 而不将自然和身体客体化的政治理念。这样的理念充满生息, 且以人与人之间的连结为本; 和以物为本的理念相比, 两者对于幸福想像极为不同。■

> 为ISA奉献的四十年： 向 Izabela Barlinska 致意

前ISA会长 Margaret Archer、Michel Wieviorka、Michael Burawoy、Margaret Abraham、Sari Hanafi，以及ISA现任会长 Geoffrey Pleyers



Izabela Barlinska 在2023年墨尔本国际社会学协会第二十届世界社会学大会上致词。

Margaret Archer(于1986-1990年间担任ISA会长) *

四十多年前，ISA执行委员会会议于波兰召开，那是我第一次见到 Izabela，她庄重地站在纷飞雪花中迎接我们。我当时以为这位身为 Magdalena Sokołowska 侄女的博士生只是来帮我们安排当地的一些行政事宜，殊不知我错得离谱。出现此地的她，并不是写论文写到一半、对 Virginia Woolf 这个主题感到厌烦了，才跑来休假一周，而是就此加入ISA，并持续为其辛劳了四十年。我们立刻就打成一片了，毕竟我拥有一张英语文学学位。不过，确实有几年，我经常在想，鼓励她离开波兰、加入四处奔波的ISA，究竟是不是个好主意。

在成为ISA会长之前也曾经担任过执行秘书的 Tom Bottomore，对此倒是完全没有后悔过。秘书处还设在布鲁塞尔时，他就已经发现 Izabela 拥有很强的行政和组织才能。作为当时少数不认为专业能力会受性别影响的男人，他成为了 Izabela 一生的支持者、挚友。我们两人，都因为他的「启蒙」而受益。当然，待在布鲁塞尔并不是长久之计，最终，秘书处预计于1987年迁往西班牙。不过，这项计画也遇上了一些困难——当地一间新成立的研究中心，同样要求ISA在马德里为其提供一处办公空间，这和为秘书处在西班牙设立新据点的计画，产生了点摩擦。我还记得几场谈判中的一些场景里面，出现过一张真的很大的桌子，也记得ISA向教育部提出抗议。

>>

我提到的「秘书处」，在1987年，指的其实就只是 Izabela 一个人而已。当时的她只是个西班牙语初学者，虽然社交能力很强，但在马德里没认识几个人，需要和房屋市场打交道时，也只能仰赖自己的常识。她快速地取得了当地专业组织的协助，解决了居住问题、于工作上展现了自身能力，短时间内就精通了西班牙文，并找到了屋顶的一间公寓。这一切都让我很难相信，我最后一次来到这里，就是和她一起看着夕阳、共享了一瓶酒的那次。

因为执行委员会会议每年都办在不同地区，Izabela 和我踏遍了世界各地，在全球化这个词出现之前，我们早就全球化了。我成为会长后，和她的合作关系更为紧密，也是这时候，我才意识到她需要负责的业务范围有多么庞大。从创办新期刊《国际社会学》、将西班牙文纳入为第三

个官方语言、处理激增的研究委员会带来的行政庶务，再到欢迎国王和王后参加世界大会(1990)等等，这些任务都与她有关，但她却毫不费力地将这些工作一一完成。

后来，Izabela开始尝试完成她早年的目标：取得博士学位。这次，论文主题是波兰的团结工会运动，后来以西班牙语、波兰语出版。这几年，我们一直保持着联络，我们通常会一起到某个地方度假一周(Céline Saint-Pierre也常常一起来)。我成为潘普洛纳纳瓦拉大学客座教授之后，我也有幸经常拜访马德里，和她共度几天时光——买靠枕、逛艺术博物馆、在她家的屋顶花园再开一瓶酒。没有 Izabela，就没有现在的ISA，她过去的付出，影响了如今ISA的每一位成员，包含那些无缘遇见她的人。愿她回到波兰后，能感觉回到了自己的归属之地。■

** 此文是 Margaret Archer 在2023年4月2日，也就是她去世(详见编辑的话)的一个月之前所写。*

Michel Wieviorka(于2006-2010年间担任ISA会长)

ISA... IZABELA..... 这么说也没错，有 IZAbela 在的ISA，确实很「Bella」(法语中指带有魅力、美好的)。自1982年(墨西哥!)以来，我就加入了ISA；在担任会长期间，我也和她有过许多一起合作的经验。要我说的话，我认为，要是没有她在，这个组织肯定不会成为现在的样子。

他的工作效率难以置信的高，而且待人非常友善。她清楚地知道我们的生活是以知识与

科学为核心、理解这样的生活如何运作，行政能力也很出色。她是一个全球化、国际化的人，而且——从波兰的政治与社会生活，所涵盖的那些美好特质来说——很波兰。她总在必要，或能带来帮助的时机出现，但不会做过头。她了解一切、理解我们，但不会过度地干涉。容我以法语补充：Izabela 不仅是ISA的批判行动者，她也是一个优雅的人，具有「la classe」，且是「grande classe」。愿她在新的旅途中一切顺利。■

Michael Burawoy(于2010-2014年间担任ISA会长)

Izabela Barlinska 致力于发展ISA，也为国际社会学与近来的全球社会学贡献良多。另一位对此有许多贡献的 Margaret Archer 于近日辞世，让人十分难过，两人在ISA于马德里成立的关键时期，协助彼此完成了许多任务。历任会长中，她是跟 Izabela 最亲近的。她对

Izabela 的致意，可能是她最后写下的文字之一。

Margaret Archer 向我们讲述了 Izabela 如何被她的阿姨招募，并于1977年接待了前来华沙的执行委员会。那是在团结工会运动发生的四年之前，Izabela 还是一名学生的时候。1981

年12月戒严令发布，团结工会的地下领导人，鼓励 Izabela 接下ISA的邀请。他认为，Izabela 可以在西欧，成为波兰反对派与流亡者之间的重要纽带。需要澄清的是，Izabela 并没有逃离祖国，也没有到西方寻求庇护。应该说，她根本没想过要不要这样做。她是波兰的忠实公民，一生尽其所能地为波兰的民主力量提供支持。从这个角度来说，Izabela 的一生，与今年大会的主题反威权政治，其实也挺切合的。

虽说 Izabela 一直不喜欢炫耀自己的知识和专业，但我还是希望大家可以记得，她作为社会学家的贡献。领导ISA期间，她在马德里康普顿斯大学撰写了博士论文，指导教授是 Víctor Pérez-Díaz。这篇论文叫做《波兰民间社会与团结工会》，以西班牙文出版，并以波兰团结工会和戒严法下的日常生活为研究对象、关注反对国家与党派结合的势力如何变迁。这篇作品呈现了苏联终结如何开始，不过她撰写论文的当下，也还不知道会有这样的结果。这也提醒了我们，反威权的抗争，可能不会在短时间内成功，但其能够带来的影响，却也非常巨大。

似乎偏题了——让我们回到正题，来谈谈 Izabela 对 ISA 的贡献。我同意 Margaret Abraham 和 Michel Wieviorka 的观点：Izabela 一直是ISA的重要支柱。我们不要忘记，她1977年开始和ISA合作时，整个组织的成员还不到1000人。1987年，她担任执行秘书时，会员人数还不到2000。到了疫情来袭之前，会员人数已经超过了5000。研究委员会、国家协会的会员数量，随着会议的出席人数增加而有了大幅

成长。一年两次的论坛，也是在她的领导下引入。这四十年间，Izabela 在她康普斯顿大学的小小办公室中，率领 ISA 走过了一次次重大变迁。她和兼职成员 Nacho、Juan 和 Lola，一同维系了整个组织的运作。我们必须记得，美国社会学协会现在的会员，只比 ISA 多了一倍，却有23个全职员工！直接点说：ISA 的财务健康，是有赖于 Izabela Barlinska 的无限能量、奉献精神与组织才能。

她之所以能在担任执行秘书期间，和这个令人畏惧的、争议不断的「小型联合国」谈判，正是因为她有意识地不主动接触 ISA 的政治事务。在执行委员会会议中，即便受到强烈的挑性，她也无动于衷。她的目标一直以来，都是为 ISA 的运作提供支持，以及促进重要的创新，例如：沃勒斯坦的区域研讨会、马丁内利的博士实验室、阿切尔的新期刊《国际社会学》。

执行委员会负责做出决策，而 Izabela 则尽其所能地完成这些任务。她从来不会主动推卸责任。我还记得德本 ISA 会议的时候，她一直在处理为登记而排队的人潮，甚至为此超时工作。她总是在 ISA 会议的最前线，正如会议之间，她也总是维持着 ISA 的运作。无论危机发生在世界哪一处的会议现场，不管是我们的据点被强行关闭、大会或论坛场地出问题，还是监督ISA的预算，她都处理得非常完善。和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的国际组织相比，ISA 拥有一段悠久而繁荣的历史——我们都欠 Izabela 一个大人情。祝她回到波兰后开启的新事业一切顺利。■

Margaret Abraham (于2014-2018年间担任ISA会长)

能够认识 Izabela Barlinska 博士三十多年，并为之密切合作，绝对是我三生有幸。Izabela，您在危机中总能保持冷静、精通多种外语、拥有极强的制度记忆，且关注ISA各方面的工作，这些特质极为珍贵。在担任ISA副研究长，以及ISA会长时，我和您有许多合作，我认为正是您的大力支持，促成了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第二届ISA论坛，以及多伦多的第九届ISA世界大会。如果没有您和您团队的付出、能

力、专业与合作，我们不可能完成这些。身为一名女性主义者，我很庆幸ISA秘书处是由有这样一位了不起的女性、专业的社会学家领导，她卓越的见识与务实精神，为全球社会学界贡献良多，并使得ISA的薪火得以延续。ISA是个优秀的组织，而我很高兴您曾一直在这段旅程中陪伴着我们。我向您致敬，并衷心希望您能感受到我充满谢意的拥抱。■

Sari Hanafi (于2018-2023年间担任ISA会长)

看 完前面的这些文字,我觉得自己已经没有什么好补充的了。不过,和前面这些历届会长不同的是,比起他们,我在生涯的很早期就认识 Izabela Barlinska了。那时我还在读博,也是1990年Bielefeld大会青年社会学家世界竞赛的获奖者之一。她不厌其烦地回答了我的许多问题,如此的亲切让我印象深刻。其中一些问题其实很笨,毕竟那是我第一次参加大型会议。

自那时起,我一直与和她保持着联络,包含担任执行委员会成员、国家协会副会长,以及最近担任ISA会长的时候。每当我需要时,她从不吝于给我一些充满智慧的建议。必须说,即便我有时候不会听从这些建议,但她从来不会因此生气,真的很厉害。总之,我不记得 Izabela 有在任何情况下,表露出过度愤怒的情绪。即使是特别激烈的讨论,她也会在冷静思考后回应。我很羡慕她的冷静。

我经常在会议之外的场合和她交谈。我们很少聊同事的闲话,反而比较常讨论黎巴嫩、巴勒斯坦、波兰、社会学、艺术、文学等话题。身为一个具有国际视野的人,她拥有丰富的大众文化知识。疫情时期,我们经常与副会长、执行委员会和其他委员会开线上会议。她通常不会在Doodle的投票里面表达自己的选择,因为她总是希望能找到对大多数与会者来说最佳的开会时间。有时候,我也会因此有点尴尬,因为这些最佳时间,常常是清晨或深夜。

Izabela熟知ISA的历史,所以她知道什么做法更容易奏效,也知道社会学家社群会对ISA执行委员会的决策,作出怎样的反应。Izabela,我们之前说过,打算有一天一起去爬山。为了维系我们在ISA之外的友情,我现在更想要去爬山了。谢谢你, Izabela, 谢谢你在过去的40年中,为ISA所做的一切。ISA真的欠你很多……。

Geoffrey Pleyers (于2023-2027年间担任ISA会长)

前 述文章中,ISA的历任会长已经呈现了 Izabela Barlinska 过去四十年间如何参与ISA的历史,并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作为ISA副研究长,我有幸见证她的付出,包含最近的转型准备、培训新执行秘书等等。她抱持着对ISA的热爱,以特有的谨慎高效地完成了这些任务。借此,她也透过具体实践,为我们上了一课。她提醒我们,ISA比任何人都重要,且值得我们如此付出。希望我们组织,甚至世界上所有的组织领导者,都能有这样的精神,并愿意用智慧、贡献与对组织的热情,尽心尽力地培养后人。

Izabela Barlinska 对ISA的影响无人能及。对成千上万的社会学家来说,她就是ISA的代言人与门面;任何质疑研究委员会或是执行委员会的人,都可以看看她的所作所为。如今,我们从她手中承接了这个极为优秀的,曾在各大洲捍卫、发展社会学的组织。我们一定要维持同样的标准,继续发展下去。ISA是属于她的,这四十年来ISA一直是她的归属,今后也将是如此。我们会确保未来数年,甚至数十年间,ISA当中仍然能保有专属于她的位置。我们都希望能在ISA的论坛、活动中再次见到她。

想要知道更多关于 Izabela Barlinska 的事情,可以参考2012年《全球对话》中发布的专访,由 Michael Burawoy 担任访谈人,文章分为两部分:[Part I](#) & [Part II](#)。

> 全球社会学的四个转变

Geoffrey Pleyers, 国家科学研究基金会, Université catholique de Louvain, Belgium, ISA 会长 (2023-2027)



| 圖片來自 Freepik 的 macrovector image。

会长上任, 第二十届世界社会学大会, 墨尔本, 2023年7月1日

虽说社会学的目标, 就是要理解世界如何转变; 不过这个学科本身, 也会受这些转变影响, 而全球社会学又更是如此。由于这个世界在过去几十年间经历了许多变迁, 我们需要重新检视全球社会学。我从1990年代末, 就开始研究全球化了。当时, 全球化已经是社会学的热门主题之一。举例来说, ISA在1990年举办的世界大会, 主题就是「一个世界的社会学」。三十三年后的今天, 这个世界变得更「全球化», 其面临的挑战也更加严峻; 此外, 人们理解看待世界、全球化和社会学的方式, 也有剧烈的变化。在这篇短文中, 我将提到四个转变分别为何、为什么要改革全球社会学, 以及这四个转变对ISA来说代表着什么。

> 沟通与联络的新工具

自1990年代以来, 最引人注目的变化之一, 是「新资讯与通讯技术」被大量使用。网路与虚拟世界在1990年代萌芽, 但连结性很快地被认为是加剧的全球化世代的基础 (Castells, 1996)。如今, 数位媒体和技术, 已经成为大多数人生活中很重要的部分。它们彻底改变了我们沟通、接收讯息与共同生活的方式; 并对不管是民主、非自由还是极权政体下的公共空间, 造成了极大的改变。

数位通讯的技术, 也为ISA与全球社会学带来了挑战与机遇。数位通讯提供了让世界各地的社会学

>>

分析被看见的机会，并让人们得以接触到更多的公民与政策制定者。ISA在疫情期间，组织了第一次的大型社会科学线上会议，有三千五百多名研究者参与。如今ISA的社群媒体，让我们的社群每天能够充满活力。线上会议也让人们有更多动力参与ISA，特别是研究理事会的线上会议。

> 有限的地球

气候灾难与日益增长的生态意识，已极大地改变了全球化的意义与经验。在1990年代，「全球化」指的是在冷战结束后，西方市场模式与形式民主在重新统一的世界中无止尽地扩张。如今，随着气候崩溃与自然被破坏，全球社会学的核心有了新的形式。

「我们该如何在有限的地球上共同生活？」这可以说是社会学在21世纪必须解决的核心问题。生态与环境议题不仅仅是社会学的特定对象，它们与所有研究主题的对象与领域相交，成为社会学的核心问题。它们将改变我们的学科，改变我们对社会学与社会学者的期待。这将是ISA未来四年的核心主题。

> 不是民主的扩张，而是威权主义的崛起

1990年代时，大多数知识分子、政策制定者和公民社会行动者都有一个共同的信念，或至少有一个希望，亦即由网路带来的全球化与增强的相互连结，将使得民主得以扩张，人们将更尊重人权。

在二十几年后，我们为2023年世界大会所选择的主题是「复兴的威权主义」。不幸的是，这个由 Sari Hanafi 做出的选择，很好并且很适当。阿拉伯之春爆发后，人们对新一波民主化浪潮的热忱在接下来的十年间逐渐消退。政府对自由的限制与专制的政权在各大洲逐渐壮大。他们学会了使用社群媒体与通讯技术有效地控制人民、干预其他国家的选举，并向全球宣传其叙事与政权模式。

社会学者与社会科学家对威胁到民主的专制政权、行动者、以及运动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这也时常使社会学者受到威胁，与自由相关的研究在许多国家都会受到挑战，无论是因为国家控制逐渐增强，或是由于学者会受到极右翼派人士与准军事化军队的威胁。在这个时代，全球社会学需要特别关注并支持在进行研究时受到威胁的社会学者。在2016年一月二十五日，年轻的义大利社会学者，同时也是ISA研究委员会(RC47)的会员 Giulio Regeni，在开罗研究独立工会时，被埃及警方逮捕、杀害。在2021年的论坛上，我们向Marielle Franco 致敬，他是一位社

会学者、地方政治家、以及反对国家暴力的行动者，其在2018年三月十四日，在里约热内卢被帮派谋杀。在安卡拉监狱内写出2021年ISA论坛上最有洞见的文章之一的卡尔顿大学博士生 Cihan Erdal，在伊斯坦堡做田野调查时被警方逮捕。

> 全球南方的崛起

在1990年代，全球化与西化合二为一，将西方的市场经济、文化、生活方式与世界观向非西方国家传播。在二十一世纪的全球化，是指来自世界各地的行动者与国家的崛起。全球媒体关注着这些经济与地缘政治行动者的崛起，这些行动者作为知识生产者的角色也越来越重要。

很少有学科像社会学一样受到这种崛起的影响。不同大陆间的社会学家建立起了更深层的连结与对话，全球南方的学者所从事的开创性的工作被更广泛地传播，这个学科对于历史与地理的新观点，也转变了「全球社会学」的意涵。在1990年代，全球社会学的文献皆是由西方学者主导。全球南方和「东方」通常被视为西方概念的经验研究场域。如今，全球社会学的核心在于，让全球南方的学者与行动者的贡献能够被看见，并借此挑战欧洲中心的知识霸权。全球南方学者的理论、概念与分析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全球南方与全球北方现在面临的社会挑战。这些改变了我们看待现代性、不平等与环境正义等重要概念的方式，也为我们展示了学科与自然、世界、以及我们自己之间，不同的连结方式。

去殖民、下层阶级与后殖民的观点与其批评者的宣称相反，他们并未将认识论聚焦于抹去「西方社会学」的贡献，并借此开展「去殖民社会学」。就如同世界上任何地方所生产的知识，欧洲与北美的社会学应该定位于它的时间与地点，挑战普遍主义的主张，并与全球南方的概念、世界观与理论进行新的全球对话。

全球社会学既不能紮根于西方的大学与宣称自身具有普遍性的原则，也不能侷限于对这种西方社会学的批判。

去殖民、后殖民与下层阶级的观点让我们能够去定位社会理论，让我们与不同世界的现实与知识对话，借此重新审视我们学科的关键概念。为不同大陆的研究者与方法开闢对话空间，并促进全球南方与受压迫少数民族的认识论与学者能与我们相融，这也是ISA成立的主要目的，这也是1990年代以来，Immanuel Wallerstein 发展计画的核心目的。

更全面地纳入来自各大洲的社会学者、研究、分析与理论，不仅是为了社会学的民主化，也是为了提高我们对社会现实，以及对行动者的理解。因此，我们要做的不只是将更多来自全球南方的人纳入ISA的成员当中，我们也需要鼓励这些人积极地参与ISA、研究委员会、我们的活动与我们的计划，并支持他们的国家协会。

> 开放与关怀

全球社会学不只是一种理论研究的方法、或是一套认识论的辩论、或是对于方法论的挑战。它也是社会学的、文化的、与个人的立场。

在去殖民化转向后，全球社会学对于不同世界观、文化与社会背景采取更开放的立场。这样的尝试立足于我们能够接受自身可能将失去某些确定性，并试着从与他人的相遇中学习。它的根基与动力在于，我们承诺并且也乐于阅读和认识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以开放的态度从不同的角度看待我们的研究对象，借由不同的取径理解他们，也许还能以不同的方式理解我们自己，以及我们在世上的位置。

无论是来自世界不同地区的、具有洞见的研究与理论，在不同方法与分析间，以开放的态度进行对话，以及相互学习的意愿，都是改版后的全球社会学的重要成分。

ISA的主要角色是建立起一个鼓励跨文化对话的空间。在这个空间当中，我们可以在具有支持性的环境中分享我们的研究成果与观点。想要实现这样的企图，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意图、论述与分析，还需要开放、宽容与互相关怀的实践，特别是在国际化与多元文化的环境中。

让我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几个月前，我参加了一个ISA博士实验室，其中一名参与者是从巴勒斯坦经过漫长而紧张的旅程后，精疲力尽地来到这里。在晚上用餐时，他因为在边境时经历了长时间的审问而恐慌发作。另外两、三个参与者小心翼翼地将他带到另一张桌子，听他说话、支持他。一个年轻的博士生主动在附近的饭店订了一间房间，照顾她并确保他当晚的安稳。隔天早上九点，他们两人都回到了团队参加开幕式，准备在未来一周与来自世界各地的博士生与研究者进行深刻的学习与交流。这件事被处理地如此完善又周到，甚至当天晚上我都没有注意到发生了什么事。这个具体的行动告诉我们，互相关心是发展全球社会学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虽然在大多时候这些是不会被看见的，但这种关怀和行动上的团结对ISA很重要。我举的例子告诉了我们，ISA和全球社会学不只发生在我们举办的大型会议与代表大会上。ISA体现在不同文化间的接触、来自世界各地的社会学者间的交流、对世界各地观点与研究的开放，以及让我们能够在充满支持的环境中分享它们的关怀的实践，在一个威权主义、民族主义、不平等与环境崩溃日益加剧的时代，发展这样立足于接纳他人观点与关怀实践的全球社会学就显得非常重要。

在第二十届世界社会学大会即将结束之际，让我们带着这样的关怀，在实践中实现对全球对话的开放性与对彼此的关怀，让我们共同建立一个新的、更加开放的全球社会学，从我们作为社会学者、研究者、教师、公民、以及人类，在我们所活跃的日常生活中开始。

我们这个世代所要面对的巨大挑战是全球意识在逐渐形成，这让我们能够一同面对我们将面临的挑战，从全球暖化、环境危机、日益加剧的不平等与威权主义对民主的威胁等等。如果我们这些社会学者能够胜任这项任务，社会学将有助于人们提高这种全球意识，并为解决本世界的一些挑战中贡献一份心力。■

来信寄至：

Geoffrey Pleyers

<Geoffrey.Pleyers@uclouvain.be>

Twitter: [@GeoffreyPleyers](https://twitter.com/GeoffreyPleyers)

Geoffrey Pleyers 的相關著作：

[Global Sociology as a Renewed Global Dialogue](#), Global Dialogue, 13.1, April 2023.

[For a global sociology of social movements. Beyond methodological globalism and extractivism](#), Globalizations, 2023.

> 向 Margaret Archer (1943-2023) 致上个人的敬意

Martin Albrow, 伦敦, 英国



来源: Manuel Castells Clemente / Universidad de Navarra

Maggie 离世的消息实在令人痛心! 我们已相识许久, 1966年因为彼此都担任了英国雷丁大学新成立的社会学系的讲师, 而有了第一次的相遇。23岁那年她完成了伦敦经济学院的博士学位, 研究英国工人阶级家长的教育期许和其对子女的影响; 那时, 大他五岁的我却连硕士学位都还没完成。或许是我被他震慑到了! 所以决定离开那里, 留下他在接下来的七年独自面对疯狂的教授。纵使如此, 他仍旧出版了14篇论文并去了华威大学, 在那里渡过了大部分的学术生涯。那段期间, 我们始终保持着联络。

他是一个出色的工作者, 全然地专注于社会学, 将它作为一门专业而非自己的工作去精进。我不想像其他人一样只去讚扬他对这个领域的核心思想贡献, 我想特别致敬我们一起在ISA所做的努力。作为

当时 ISA 出版品委员会的主席, 为了与主流期刊过份关注国内议题的状况抗衡: 这些期刊纵使表面上对全世界开放, 但仍旧要求所有的投稿需要以英文撰写, 他主动找我一同创建《国际社会学》这本新的期刊。但我们鲁莽地说我们可以安排任何语言的翻译! 而我们也做到了, 特别是针对中文的翻译。

我们的创刊号于1986年发行, 前言由ISA主席 Fernando Cardoso 撰写, 那时他还不是巴西的总统! 期刊中的六篇分别投稿自波兰、印度、挪威、保加利亚和美国(两篇)。任务达成! 当时我们是这么想的, 但为时过早, 因为最初的期刊协议与我所在的卡地夫机构一同倒闭消失了。我们曾经历了一段艰苦的谈判期, 直到Sage 加入, 巩固了期刊至今的名誉。Maggie 自始至终都是一个足智多谋且尽心尽力的人, 完全有资格成为下一任ISA的主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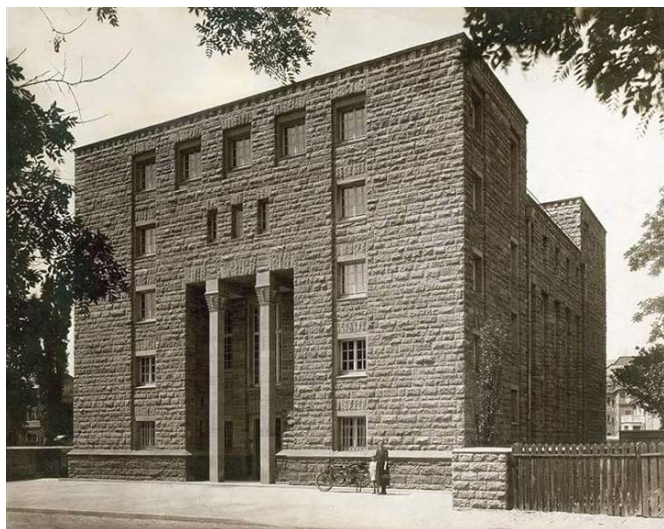
Maggie 实在是一个出色的激励者, 总是成功的在各种场合动员起适当的人才。我最后一次体会到他优秀的的能力是在宗座社会科学院的一场会议上, 他同时也在2014年担任了该院的院长。我永远不会忘记他曾主持一场与会者包含 Bernie Sanders 和 Jeffrey Sachs 的会议。

但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果然还是1990年在马德里举办的世界社会学大会开幕式上的那一景象。4000名代表相挤在宽敞的礼堂中, 等待着最尊贵的嘉宾上台。西班牙皇后、Maggie 和西班牙国王依序上了舞台。她, 即将卸任的ISA主席, 雍容华贵且如雕像般, 身着一席白衣, 庄严地向台下挥手。他注定是个不凡之人, 有着无人可比拟的才华。她总是给予身边的人所需的支持, 但却从来不要他们做出不忠于自己的事情。全世界的社会学家都将会深切的缅怀他, 而他对社会学的贡献也将长存于世。■

2023年6月26日

> 批判理论和全球社会学： 姐妹同盟？

Stephan Lessenich, 法兰克福社会研究中心, 德国



1920年代, 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

在 社会研究中心成立的一百周年之际, 也同样是所谓法兰克福学派成立百年的日子, 是时候来问为什么法兰克福式批判理论会衰落, 又是在什么时候衰落的呢? 一般而言, Jürgen Habermas(哈伯马斯)于1980年代早期提出的沟通行动理论被视为此学派的重要转折点。哈伯马斯的理论不只为批判理论思维中的有效去物质化铺了一条路, 并且也使阶级分析和资本主义再生产理论退居后位, 甚至被置于边缘位置。不只如此, Habermas 着重在对自由民主的内在批判, 使第二代批判理论毅然决然的往完成政治上现代性的「未竟之事」方向前进; 以欧盟作为规范性期望的主要对象, 也是晚期现代以及后民族社会的社会民主设计的潜在模板。

> 忽略全球化的欧洲中心式批判理论

在这样的背景下, 声称批判理论在某些层面上忽略了全球化并非夸大的说词。至少在哈伯马斯学的流派中, 它主张了某种欧洲中心主义, 或说是代表

大部分第一代批判理论学者的西方中心主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 西欧工人阶级反抗资本主义的革命失败(或缺席)之谜推动了批判理论的萌芽; 1930年代初期批判理论开始质疑法西斯主义的物质和社会心理基础, 以及国家社会主义的兴起; 自1945年起, 往后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直到1960年代晚期的学生运动), 推动批判理论发展的的问题是: 民主是否能深植在后法西斯时代的德国(或说, 撇除此一特定问题, 转而问当理性被破坏且成了谜思之后, 社会解放的潜力究竟有多大)。因此, 纵使批判理论在美国经历将近二十年的间歇期, 直至今日, 它仍旧带着从发展初期就有的浓厚欧洲色彩。正如社会研究所自21世纪初以来声称要做的调查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规范性悖论, 这可以说是反映了这种结构性偏误的结果: 同样, 以西方现代性的内在批判为中心的科学(或政治)议程, 指责其将个体化和自我决定理论从一种解放的承诺转而变成了一种制度需求。

从世界上其余(资本主义)地方的观点来看, 这种研究议程显然是古怪且自相矛盾的。一个世纪以来, 无论是西方殖民主义、帝国统治主义, 抑或是去殖民化和后殖民主义的历史, 几乎所有经典和当代的变异都明显地在近晚期资本主义的批判理论中缺席。批判理论界并没有任何重大、广泛或长久的尝试, 试图将欧洲和欧洲历史经验一或批判理论本身一地方化。直到近期, 批判理论家所批评的资本主义再生产逻辑仍旧是西方资本主义逻辑的同义词: 这种批判的规范性视野侷限在参与欧洲启蒙运动的固定领域; 其分析和评断思维的经验几乎参考自西半球(或最近的「全球北方」)富裕民主国家的社会现实(或是被如此描绘的社会现实)。

> 批判理论与全球社会学

书写至此, 我们应该很清楚, 批判理论应当有意将自身向所谓的全球社会学开放。但为什么全球社会学要担心批判理论呢?

>>

先让我就我的理解简述一下全球社会学的内涵为何。首先,全球社会学的视角是具关系性的,系统性地将资本主义世界下某地的社会现象与另一地正在发生(或已经发生)的事做连结:将西方经济的成功与剥削其他地区「廉价」劳力和自然资源连接起来;将任何「民族社会」中生活机会的社会结构与(不断变化的)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的统治结构连系起来;或找出特定政治秩序的潜在合法性与政治秩序稳定运作的成本和条件有效外部化的可能性之间的关系。第二,全球社会学在实证方法是去中心化的,亦即系统性地将构成「现实资本主义」(和资本现实主义)制度的逻辑和世界上各个地方、区域、国家与跨国实体和实践的多重性纳入考量。第三,全球社会学网路化其专业实践,它以一种——无论当下情况为何或纵使地位不平等都尽可能合作——的方式,将全球各地的研究工作串连起来,此一非竞争性的研究学界致力于重建全球时代下资本主义再生产的批判工作。

显然,这样的图像不仅是典型化,更是理想化的:一个对未来全球社会学理想典型的版本和愿景。但现实与理想情况仍存在着差距,特别是在全球社会学的第三特征上,因为全球社会学家往往被学术领域的政治经济力量个人化、部门化和国家化。当然,在国际社会学协会或拉丁美洲社会科学理事会(地区性的)都有一些相关的核心研究机构中心,也有《全球对话》这本重点期刊,但全球社会学仍旧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 批判理论可为全球社会学提供的启示

再次重申问题:具有去全球化特性的批判理论在全球社会学这条路上能够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以我的观点来看,在其历史根源具反思性的批判理论可以在双重意义上为正在形成的全球社会学提供协助。一方面,它具有矫正作用,透过给予全球社会学一定的阻力,使其能够辨别每个角落的「革命主体」,从而使全球社会学避免一厢情愿的想法,也避免不经批判的牵涉时下的社会运动。另一方面,批判理论以一种有些自相矛盾的论证方式有效的让全球社会学认知到,处在我们正目睹的社会扭曲和社会矛盾核心的,正是资本主义,任一学派的资本主义皆是。从佔领美洲到最近强化的欧洲堡垒,资本主义一直且持续在全球发挥作用。面对现实吧:资本主义是会杀人的。

因此,无论是否合理,我都将全球社会学和批判理论视为彼此的盟友;想当然耳,让他们结盟的正是社会研究和科学批判。■

來信寄至:

Stephan Lessenich

<lessenich@soz.uni-frankfurt.de>

> 棉花殖民主义：资本主义的后殖民反思

Gurminder K. Bhambra, University of Sussex, 英国



棉花种植园。来源：iStock, Mark Castiglia, 2023。

许多社会学取径——特别是受到马克思和韦伯启发的那些，将现代资本主义视为一种独特的社会经济形态。批判理论中关于人类解放与潜能的规范性论述，也带有类似的观点，且呼应了 Nancy Fraser 和 Rahel Jaeggi (2018) 将现代资本主义理解为「于历史中异步开展的、积累制度的路径依赖序列」的视角。

这套发展序列的概念，认为现代资本主义出现于欧洲，是起因于小型生产者为了创造商业盈利机会，而打破了封建社会的阶层制度。不过，现代资本主义的殖民背景，很容易在此一视角中被忽略。举例

来说，在海外占有土地、劳动力的现象，与为了创造国内劳动力市场，而在国内发生的圈地运动，两者的脉络并不相同。此外，上述现象，也和国内生产所必须的、由国家发起的殖民主义政治进程无关。

在这篇短文中，我将说明为何殖民主义对于理解资本主义极为重要，并解释资本主义如何形成。如果想要阅读较长的版本，请移驾到[这边](#)。这篇文章中，我想借由一个具体的案例，来说明我的论点，并指出批判理论等社会科学中理解资本主义的方式，不仅忽视了殖民主义的影响，更带有欧洲中心主义。

>>

> 没有棉花的棉花工业

十九世纪中，在棉花工业发展、纺织与织布技术改革等条件下，曼彻斯特从一个小小的地方城市，摇身变为一个闻名全球的城市。这促使曼彻斯特成为工业革命的象征，人们讨论资本主义时，也一定会提到这个城市。

正如 [Utsa Patnaik](#) 所言：一个不生产棉花这项原料的国家，是怎么以棉花产业为基础，开展了一场工业革命呢？棉花原生于印度，而非英国、甚至欧洲。种植棉花、制造棉纺纱，最早可以追溯到5000年前的印度河谷文明——可以说，印度早就已经是多个地区的棉纺纱出口国。

17世纪，英国东印度公司开始大量进口印度的棉纺纱。17世纪末，这种新型纺织品受到热烈的欢迎，甚至导致羊毛商向政府请愿，希望能全面禁止这项产品的交易；就连「[使用羊毛以外的任何裹尸布](#)」都是违法的。这些政策一直持续到18世纪末，其虽然保护了羊毛产业，却催生了国内的棉纺织业。

> 社会学与历史学的视野死角

打压印度纺织品进口的重商主义政策，开启了一段长达150年的保护主义时期，却正好为曼彻斯特的棉纺织业，提供了成功的背景条件。然而，正如Patnaik所指出，研究英国工业、技术革命的众多历史学家，包括Deane和Cole、Landes、Hobsbawm、Floud以及McCloskey、Hill等人，都没有提及这些。以现代世界的崛起和政治经济问题为研究对象的社会学家们，也同样忽略了这点。

18世纪初，英国透过成衣纺织品贸易，佔据了全球市场份额的25%。19世纪末，借由殖民政策，英国已经成功将印度变为供应原料的棉花生产地。印度的制造业被系统性地摧毁，依赖这项产业生存的人们，也受到极大的影响。

不只如此，英国还有另一个原料来源，即美国的奴隶在种植园生产的廉价棉花。19世纪时，棉花种植园不仅存在于美国南部各州，更遍布印度和西非。1840年代，曼彻斯特商会和新成立的棉花供应协会，就曾经试图游说印度殖民政府优先种植新奥尔良品种棉花，以供应英国制造业需求。

> 资本主义由殖民主义而生

如上所述，英国的工业实力，并不是以国家内部的工业革命为基础；其涉及了印度制造业所经历的系统性毁灭、强迫劳动的全球种植园经济，以及对于原料产地市场的强制开放。是故，殖民主义与那些被视为以工业为基础的发展现象，以及随后资本主义的出现，皆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这种过程不仅与(自由与非自由)劳动的剩餘价值佔有相关，也涉及土地佔有、他国地方产业、制造业体系的破坏。

> 沒有理解就沒有改变

这样的概念革新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大多数针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观点，都集中在资本和劳工之间的关系，以及后者反抗的可能，并将后者视为资本主义转变的关键。正因如此，这些以剩餘价值、资本为批判对象的分配正义观点，忽视了其他形式的不当佔有。这些被忽略的现象，对于资本主义长期以来的运作与维系，也是同样重要的。■

來信寄至：

Gurminder K. Bhambra

<G.K.Bhambra@sussex.ac.uk>

> 边缘逆写：殖民经验的世界化

Manuela Boatcă, University of Freiburg, 德国, ISA历史社会学研究委员会(RC56)成员

2004年在墨西哥市举行了一场「与欧洲和拉美对话：批判理论与其当前的批判任务」国际论坛，与会者多为来自德国与拉丁美洲的学者。其中，阿根廷学者 Enrique Dussel 在开幕演讲中，以「[从批判理论到解放的哲学：一些关于对话的议题](#)」强调他想要认真看待「对话的主体和其发声位置 (locus enuntiationis)：我们是谁和我们在哪里发声」。此外，Dussel也表示，这样的对话并不常发生，他们使用的术语有时模糊不清，也鲜少能够对等地进行。

除此之外，在 Dussel 眼里，「具有全球有效性的批判哲学」于二十一世纪的主要任务，尚未完成，但其任务可能是「从那些被排除在全球体系外的观点出发，和在特定国家中被排除的（贫穷）人士 (Dussel, 2004)。这样的呼吁也刚好吻合其他早先与当前的呼吁：拉丁美洲的依附理论学者倡导从底层观点来分析；来自德国女性主义实体论学者，如 Maria Mies、Veronika Bennholdt-Thomsen 和 Claudia Von Werlhof 则呼吁「自下而上」的观点；第三波女性主义倡议从「对抗的位置」重写奴隶与殖民史；和1980、1990年代在种族和性别上数量不断增加的「立足点理论」。

> 尚未收到回应的呼吁

时至今日，几乎在 Dussel 的呼吁近二十年后，底层、边缘和持反对观点的，殖民主体的经验和立场，以及个人在全球知识生产与循环扮演的发声位置，牢牢地建立在后殖民与去殖民路线的中心。将之并置，这些理论相当于针对全球权力关系的批判，但这等同于批判性理论，或者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换言之，自2004年在论坛上设想的对话机制发生了吗？

针对这些问题，简短的回答都是「没有」。较长的回答可能甚至要从 Dussel 的主张开始，即对于全球经济差异的视而不见，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学者摒弃了「否定批判」，进而「[不再真正批判](#)」存在于边缘地区的历史事实与持续地「饥饿导致的负面影响」。Dussel 明确提到 Habermas，并警告说，一个以资本主义体系核心生活水准为出发点的批判性理论，不仅仍然是以欧洲为中心，而且表现出一种令边缘感到愤慨的「外来偏袒」。后殖民和非殖民方法之间也存在着焦点、范围和程度上的差异，而同一种方法的世代之间也存在差异。相较于1990年代专注于文化、认同和代言问题的英语殖民取向，全球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对源自于2000年代依附理论与世界体系分析的拉丁美洲解殖方法更为重要——但这是事实。今天的情况不一定如此，或不适用于所有学者。委内瑞拉人类学与去殖民学者 Fernando Coronil 在2008年批判殖民和帝国体制不同系谱的文章中指出，在美洲的批评仍然集中在政治经济的依存度上，但在独立的新兴亚非国家中具体围绕在殖民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排序中。在呼吁两个重要的传统进行对话的时候，[Coronil更重视互补性而不是差异性](#)：「批判地回应不同地方的殖民主义应采取不同但互补的形式。从亚洲的角度来看，欧洲思想的『本土化』已成为必要，但从拉丁美洲的角度来看，边缘地区的全球化也变得不可或缺：进而体认到在这个世界上似乎都是现代大城市中心和落后边缘地区所构成」。

> 殷切盼望的回复

从边缘—无论是依存理论、底层研究还是去殖民—逆写回（狭义的）欧洲中心批判理论是重要的一步。世界体系中边缘地区的社经条件，和核心领域内所谓的非现代社会关系被揭露为现代性及其阴暗

「要使批判理论中对等的对话得以发生、延续,我们必须多元化批判理论生产的地理位置和认识论位置。」

面、殖民性的构成要素,而不是被驱逐到现代之外。动产奴隶制及其后果、核心和边缘的种族隔离劳动力、美洲的剥削资产阶级和「二元经济」、非洲和中东的父权性别关系,以及有酬工资和无酬劳动形式的并存,上述所有殖民地地区的雇佣劳动不再能证明边缘地区所谓的落后,而是证明殖民和帝国统治造成的纠葛。

为了促使(广义的)批判理论间能够产生对等、持续性的对话,我们必须复数化批判性理论在地理和认识论的地方生产。在一个压倒性、不加批判、当下的、欧洲中心的社会科学中,将殖民和帝国经验置于历史现实和当前权力关系的物质基础上仍是例外,而不是常规。在这样的情况下,非西方的、非欧洲、非西方、非白人的经验长期以来遭到抹除。于是,直到晚近20世纪在西方出现了忽视种族、族裔具有不平等、分层特征的社会学;在资本主义下发展的社会学淡化了奴隶经济、契约劳工和所有形式的无酬工作;以及没有殖民者和殖民主体的移民社会学。同时,所有的叙述中都遗漏了女性的经验,透过将西方白人

女性作为西方社会学生产的客体和主体,也只能部分、逐步地纠正这一点。全球化边缘的经验——就 Coronil 的话来说;将边缘地区全球化——将使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核心进程,如欧洲殖民扩张、奴隶贸易和欧洲人向美洲移民,与西欧工业国家的阶级冲突、无产阶级化和社会流动性一同凸显,而社会学正是以此分析为基础。■

來信寄至:

Manuela Boatcă

<manuela.boatca@soziologie.uni-freiburg.de>

Twitter: [@ManuelaBoatca](https://twitter.com/ManuelaBoatca)

> 整体性与外部性： 去殖民批判理论的范畴

Patricia Cipollitti Rodríguez, 纽约市立大学研究生中心, 美国

批判理论研究社会的标志性方法之一是「内在批判」。这可以概略地描述为, 对于一个既定的社会历程, 是否以及如何搬石头砸自己的脚, 所进行的评估。正如 Nancy Fraser 所说, 批判理论家追随马克思(而他在这方面追随黑格尔), 试图找出社会的「内在」规范, 以及社会行动者通过行动所了解到的社会条件之间, 「系统性地而非偶然地」产生的矛盾, 马克思的经典例子提到了资产阶级社会的市场自由以及工人「挨饿的自由」这一反复出现的现实。批判理论家随后分析了这些危机产生的趋势, 以及危机反过来引发社会变革的可能性。

批判理论家从其所检验的实践「内部」出发制定规范性准则, 旨在避开许多主流分析道德和政治哲学的意识形态外衣。主流取径通常假定「正义」或「平等」等理想适用于不同的时间性和地域, 而批判理论家则承认理想具有彻底的历史性, 在不平等的条件下, 对理想的诉求往往是为了统治集团的利益。资本主义社会对自由的诠释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 整体性与欧洲中心主义

解殖理论家坚持认为, 这并不是故事的全部。阿根廷墨西哥裔哲学家 Enrique Dussel 认为, 像内在批判这样的辩证法的一个核心问题在于其**对整体性的自命不凡**。在当前语境下, 整体性至少有两层含义。首先, 内在批判认为, 社会评价和变革所需的所有规范性资源都可以从批判客体内部获得。只要资本主义社会构成了这一客体, 它就组成了批判的工具整体性。其次, 与此相关的是, 资本主义被视为一个全球性的结构性整体, 因为它的发展过程和情怀几乎形塑了我们星球上的每一个人类社群。

Dussel 认为这种整体化思维是欧洲中心主义的。它有问题地忽视与资本主义社会邻近但截然不同的许多生活形式。重要的是, 所谓客体整体性的外部, 即人们的思考、行动和感受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例外」的地方, 在方法论上是相关的。它们提出实质的规范性替代方案, 理想、概念、实践等, 通过这些方案可以评估和改造批判客体。例如, 非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可以具体展示与自然的非榨取性关系。

> 分析学与外部性

Dussel 将由此产生的非殖民方法称为分析法, 其中的「ana-」将批判的立场定位在物件的「外部」而非「内部」。与批判理论「从内部」进行的辩证评估相比, 从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另一面」(或「底部」) 进行思考是解殖思想的独特贡献之一。

「外部性」这一分析范畴或明或暗地出现在许多拉丁美洲解殖思想中。其中一个例子是 Mónica Chuji、Grimaldo Rengifo 和 Eduardo Gudynas 在2023年3月出版的《[全球对话](#)》中将 buen vivir (美好生活) 概念描述为「南美观点的集合体」, 而其「包含了质疑现代性的立场, 同时开启根基于特定历史、领土、文化和生态的其他思维、感受和存在方式, 的其他本体论」。土着传统为「美好生活」观点提供了大量资讯。这些作者指出, 「美好生活」在其发源地安地斯国家内外迅速传播, 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具体替代方案提供了理论依据, 如宪法对自然权利的承认。因此, 「美好生活」这一在外部性中孕育的思想得以进行分析性的批判。外部性的其他重要用途不仅指原住民社群的生活方式, 还包括乡村农民、非裔人口、城市贫民, 甚至是该地区未开发的民族国家。

> 资本的全球影响力

对马克思主义曲径的批判理论家来说, 分析可能会被误导。他们认为, 对资本主义的任何外部假设都是浪漫主义式的, 否定了 Immanuel Wallerstein 所称的「现代世界体系」在过去500年的稳固。这是不理解当代世界尺度内的社会领域, 是一个由相互关联的部分所构成的结构; 具体而言, 它是透过动态经济过程和社会实践集合而成, 由人类行动的进行, 所支撑的剩馀价值积累。根据这一观点, 核心与边缘、剥削者与被剥削者、富人与穷人、雇佣劳动与非雇佣劳动等之间的关系, 并不是严格分离的关系, 而是系统性整体的组成部分间以及其中的关系。此外, 资本的影响力是全球性的。进行货币交易、参与全球市场上游或下游的地方市场、负债、与开采公司和使用武力维护主权的国家, 都与这一整体发生有意义的联

>>

「批判理论家指出『正义』或『平等』等理想，具有深厚的历史性。」

系。用 Dussel 和其他拉美解殖思想家常用来描述外部性的副词来说，很少有（如果有的话）社区能够「绝对地」、「彻底地」或「最大限度地」脱离资本主义经济回圈。

有鉴于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忧虑，那些使用外部性范畴的人必须澄清，资本主义现代性作为整体与外部社区的不同之处并不是物质性的。大多数非殖民主义思想家都接受世界体系理论：没有世界体系理论，我们就无法充分理解当代形式的剥削、榨取或压迫。相反，相关的分离是经验性和规范性的。也就是说，居住在外部世界的人们会以不同的方式思考、感受和判断。这可能包括与市场的互动不同于系统性地从市场中获益的阶层。

> 现代二元论的问题

然而，这种回答并不能满足那些批判理论家，他们本着后现代的精神，对着名的分析性议程中关于「现代性」的概念提出质疑。在他们看来，分析性议程将现代性规定为一种文化整体，包含了由工具理性、资本主义积累、殖民主义等等所塑造的思维和情感方式，而「他者」的思维、情感和存在则从根本上与之截然不同。

对于后现代倾向的批判来说，这样的现代性概念首先在政治上是可疑的。将各种文化重新整合为具有凝聚力的整体强化了二元论的思维模式，包括自我/他者的分类。正如 Edward Said 等后殖民主义思想家所警告的那样，这种分类很容易被用来控制「他者」们。其次，它在描述上是错误的：社会生活的形式是历史上偶然的、异质的实践组合，可能通过跨文化交流而发生变化。此外，赋予这些实践意义的符号也可以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进行转换，发挥与其发源地不同的功能。正如「美好生活」的宣導者所言，生活方式与其发源地之间可能存在联系。然而，不应假定这种联系是必要、不变或根本无法沟通的。

> 作为混合文化的外部性与规范性资源的多元性

那么，那些使用外部性范畴的人不应该从「现代性」，而应该从「现代化」的角度来思考。这是一个社群参与现代的实践、符号、技术和理性的过程，比如在市场上遇到的那些。此外，由于在物质和政治上融入了世界体系，社群不得不参与其中。（在这方面以及其他方面，不对称的权力影响着跨文化进程）。借用拉美文化研究的术语，外部性是一种「混合文化」，其中的参与者每天都可能从多种并存的理性，「现代」和「传统」、商品化和非商品化，从中汲取养分。例如，为传统习俗赋予现代意义，为新引入的习俗赋予历史特定意义。在世界各地，我们遇到了多重现代性：许多不同的、不断变化的混合文化，以现代形式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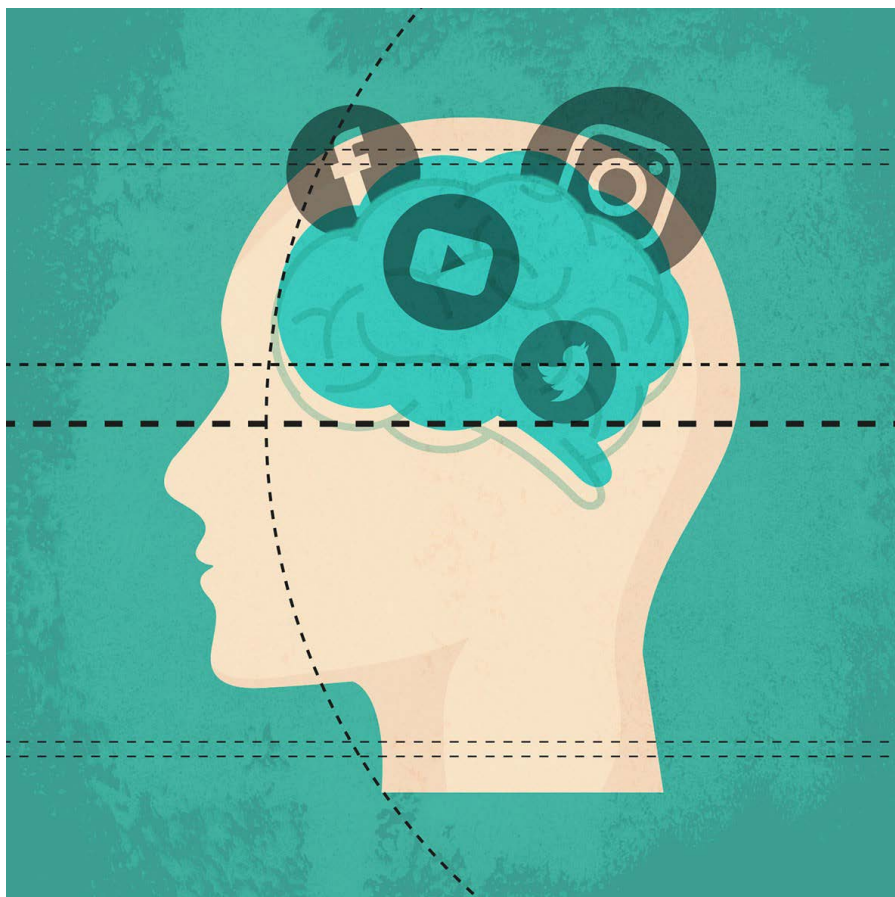
外部性的范畴正确地强调了思维、感受、存在和价值观因地而异，尤其是在世界体系中的核心与边缘（诚然是异质的）之间。但是，考虑到后现代的忧虑，我们必须认识到各地之间的关系是无孔不入的、动态的。我们应避免将外部性社群浪漫化，也不应忽视那些即使身处全球北方和西方，但其实践意义却超越了所谓「现代」理性的人，如照护工作。内部批判和分析批判都需要对全球结构（即整体性）有深刻的理解。然而，通过强调外部性，分析批判将我们的注意力转向了存在于世界各地，尤其是边缘地区的庞大多元性的规范性批判资源，以及它们可能提供的多种转型途径。■

來信寄至：

Patricia Cipollitti Rodríguez
<patricia.cipollitti@gmail.com>

> 文化工业：一个批判理论的(政治)研究议程

Bruna Della Torre de Carvalho Lima · Frankfurt University, 德国, 和 University of Campinas, 巴西



| Arbu 绘, 2023。

> Adorno 与文化工业

“文化工业是一个具争议性的概念。尽管 Theodor W. Adorno 对于将「大众文化」一词与「文化工业」相提并论持保留态度,但后者仍普遍被认为是(大量)文化商品的集合。在诸多社会学的学科分之中,「文化工业」或其某些面向已成为文化商品的代名词,例如电视或广告。在他和 Helmut Becker 的论辩中,Adorno 警告我们不要接近电视自身,而只能与文化工业体系的其他部分结合起来:仅仅从经验来研究文化工业有其限制,因为其成效只有经过数十年才能显现。然而,Adorno 和 Max Horkheimer 在《启蒙辩证法》中将文化工业描为为由「广播、电影和杂志」组成的「体系」。这是一个美感和文化体系,但或许最重要的是,它是一个社会化体系和一个制造慾望和对现实

的认同的机器。这个概念包含了学术界素忽视与劳动相关的部分,因为它是工作的对立面:福特主义社会的反面镜。然而,它也是一种文化的政治理论。

> 媒体和法西斯主义的兴起

威玛共和国期间的文化卡特化及其集中在以 Alfred Hugenberg 为代表的反动势力手中,促使 Adorno 思考媒体与法西斯主义崛起之间的关系。一方面,广播改变了反民主的鼓动;另一方面,文化工业的社会形态削弱了主体性,产生了对超级巨星的认同,为法西斯政治领袖铺设了一条康庄大道,同时又以「无私的、超越党派的权威」的形像现身。

在《新右翼极端主义的面向》中,Adorno 批评了德国国家民主党成功的秘密在于「组织」的概

>>

念。NPD将自身伪装成一个超脱党派以外的运动。这场「运动」分离了传统形式的「政党」,区分以政治和经济利益引导的现实政治(Realpolitik)制度。此外,Adorno 认为是其是从政治宣传来达成目的。从Adorno发人深省的论述中可以推论出其原旨:文化工业可以成为新的「组织」。这样的工业可以取代群众政党来建构和扩张法西斯主义的版图。

尽管 Adorno 透过他的著作将「文化工业」的概念转变为一个研究议程,但连他自己也无法预见此一体系所能担负的比例和范围。

> 网路的无私性权威取代了旧政治

在网际网路来临之前,反民主煽动者必须亲自去学校、教堂、广播站、工厂、电视摄影棚等等。在这些地方,其使用权被特定法规管辖和限制。福特主义下的文化工业,借由广播作为最主要的法西斯主义工具,利用广播将煽动者带入客厅,然而这并不发生在政党之中。生产力的最新发展,即社交网路在当代社会中的出现和重要性,已经打破了此类煽动的任何障碍,甚至连最传统的传播方式也失去了合法性,并将传统的群众政党排除在外。社交网路表现出比任何组织所渴望更多的社会毛细管渗透作用。

这些基础设施也创造了这类「数位文化工业」的物质基础及其所采取的「文化」形式。「喜欢/不喜欢」的二元装置、与行业垄断相关的锁定效应、透过定向广告操纵情绪以及许多其他人人皆知的特征,为虚拟社交和社交的形式提供模型。与之相关——更不用提使用机器人等在社群媒体和网路中进行政治操弄了。

此外这种新的右翼激进主义的成功,是由于文化工业在其数位版本中继续塑造自己为「无私的权威」。它的经济特征隐藏在其产品的「自由本质」背后,由于我们是生产和分享大部分内容的人,使得这个事实变得更加模糊。作为一个「无私的权威」,它不仅将自身塑造为「盘旋」在传统政党之上的某种东西,而且还成为旨在替代旧政治的右翼运动的理想工具。

> 新兴极端右翼与社群网路

因此,高度综合的客观机构和极度有利于极右的主体化模式之间存在同样的趋向。新的右翼激进主义动员了一种难以对话和反思的政策,这与社群网路的特征密切相关,例如:透过使用具有强烈情感吸引力的点击诱使支持激进化的投注注意力政策;产生政治参与感的能力;选择人们消费什么的演算法,反过来产生内容循环并排除一切多样化,促使内群和外群的形成。正如 [Joseph Vogl](#) 关于平台的建议,数位文化工业变得准民主化。

除此之外,这些因素增强了地方威权主义,其基础可能极其多样,扩大原有的范围,使其对政治生活具有重要意义。在历来被殖民主义削弱民主的全球南方国家,文化工业的影响力可能更为深远,这揭示了这个概念一个未被充分探索的面向:其帝国主义的展开。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文化工业也可能是一种文化帝国主义理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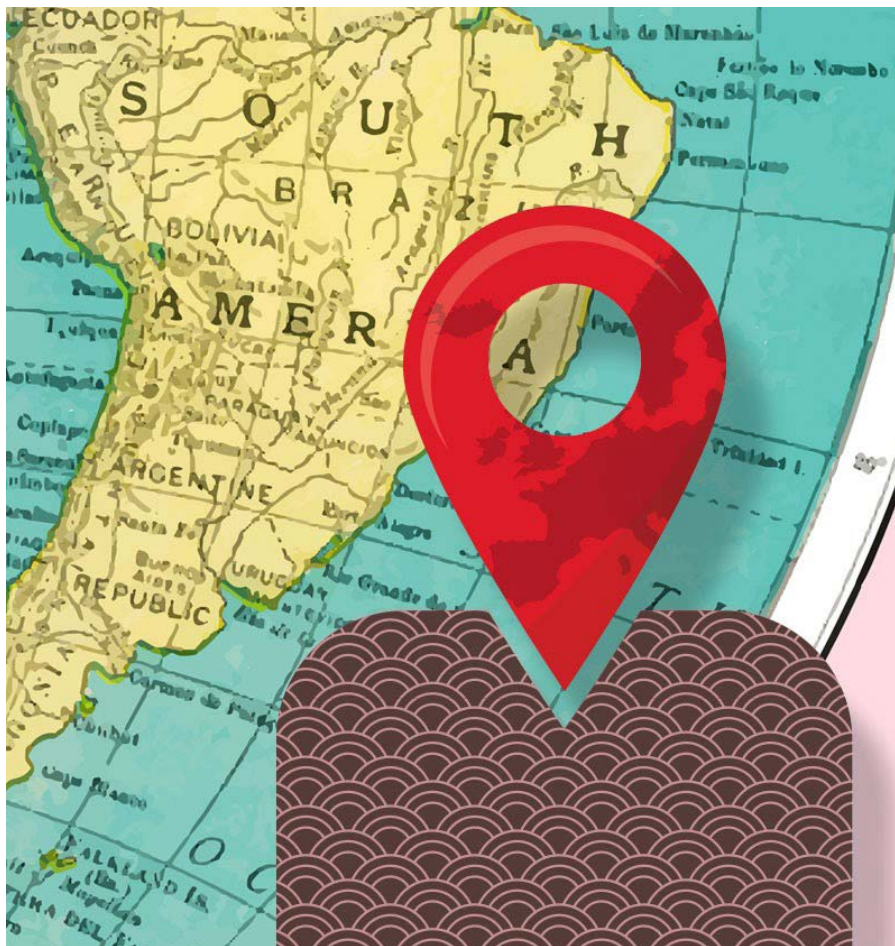
全球极右翼的兴起重新点燃法兰克福学派极权主义的研究兴趣。即便如此,「文化工业」并不被视为能够对应到此一现象的理论。批判理论(以及世界)的未来无疑地与扩张、严谨地修正和文化工业的进一步发展息息相关。然而,我们首要的任务,仍是不与世界同步。■

来信寄至:

Bruna Della Torre de Carvalho Lima
<brunadt@unicamp.br>

> 迈向全球社会的批判理论

Esteban Torres, Universidad Nacional de Córdoba, 阿根廷



| Arbu 绘, 2023。

1920到60年代, 批判理论在西半球的发展主要源自法兰克福和纽约的社会研究所。在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机构陷入困境的时期, Horkheimer、Adorno 和 Marcuse 的研究在当时具有强烈的影响。另一方面, 批判理论在1960和70年代的拉丁美洲社会学和经济学领域也有着蓬勃的发展, 包括 Raúl Prebisch、Fernando H. Cardoso、Darcy Ribeiro 以及 Ruy Mauro Marini 皆为当时杰出的研究者。然而, 这两个思潮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分歧: 第一、他们关注的结构性问题差异甚大, 再者, 两边知识分子所拥有的历史经验也迥然不同。除此之外, 拉丁美洲的批判理论更与主流政治紧密联系。因此, 即便两地区的理论发展都是以 Marx 和 Weber 的著作作为核心理论来源, 但只有深度了解其各自历史地域对知识分子与批判理论所产生的独特影响, 才得以解释为何同样传承德国思想的两个思潮却存在如此大的差异。

> 历史经验与结构性问题

每种批判理论都形塑于历史经验和结构性问题的交织性之下。区分这两面向, 则有助于我们了解批判理论究竟是从何时开始失去了对知识的贡献与促使社会变革的能力。我们发现纳粹大屠杀犹太人的历史经验, 使得法兰克福学派特别将个人自由的丧失视为主要的结构性问题。若是没有这段经验所带来的伤痕, 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则可能呈现出不同的面貌。而当拉丁美洲地区发展起飞时, 他们对核心国家的结构性依赖问题日益严重, 他们的理论就是于此脉络下发展起来。当时一些边陲国家发现欧洲学界的理论已明显不适用于他们身上, 因此开始对某些问题提出研究和批判理论。另外, 随着工业化竞争失利, 批判理论在拉丁美洲变得更为重要。然而, 出于对建设后资本主义社会而非后资本主义社会的可能性的理性信念, 拉美社会理论依然保持积

极的发展。这既不同于马克思学说所呈现的纯粹消极性,也不仅是纯粹积极性。我提到了两个不同的结构性问题,他们与两种历史经验有关,并依然存在于当今社会。最后,可见要克服长久以来自由与发展不足的问题,就必须建构出新的批判性理论,以阐释当前全球化的历史经验。

> 当代理论的偏差:非历史主义、反政治与分离主义

目前在拉丁美洲和欧洲发展的大多数的批判理论似乎已渐失影响力,其原因可以归结为三种核心思想的偏差以及长期存在的还原论知识的再生产。这三种偏差包括:非历史性的偏差、反政治的偏差和分离主义的偏差。首先,结构性议题的理论定义和公共研究议程的发展中,常常忽视了历史经验的重要性。再者,反政治的偏差与将批评本身视为唯一目的有关。第三,分离主义偏差出现两种矛盾对立的做法:一方面,他们将批判理论被孤立出来,脱离了社会学研究;另一方面,他们在缺乏社会批判理论(特别是缺乏资本主义理论)的情况下进行社会研究。Horkheimer 和 Adorno 将这种方向的研究称为「没有社会的社会学」。最后,长期以来对于还原论的问题与广泛复制欧洲中心主义社会观有关。二十世纪中,由于边陲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已进入后期的解殖进程、亚洲国家崛起等因素,城市的世界化(mundialization)逐渐出现。然而,在城市世界化遭受否定的情况下,这套佔据支配地位且自我中心的观点,原先就已经受到侷限,如今又更加的不理性且盲目。

> 法兰克福学派与拉丁美洲社会学

世界化进程是使法兰克福传统与拉丁美洲传统之间差异逐渐消弭的重要历史经验。最初双方的交流经验可提供重要观点,以克服上述的理论所面临之困境。而我们若仔细观察,会发现这两种学术传统都发挥了防止非历史偏差的作用;因此,Marx 之后的思想家如 Horkheimer、Marcuse 和拉美的思想潮流,都提供了抵制反政治偏差的建议。同样地,在努力克服分离主义偏差的过程中,想办法整合法兰克福的贡献,以及 Adorno 和 Horkheimer 对实证

主义的深刻批判,都成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最后,尝试全面挑战与重构欧洲中心主义的过程,我们一样必须参考拉丁美洲的学术贡献。

为了克服上述困境并恢复批判理论的活力,我们迫切需要推动能发展新的全球社会批判理论的一套典范。我指的是一种理论实践,应被视为社会研究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并透过科学式方法重启批判理论,最后透过社会转型策略来检视此理论。此外,我们也需要构建一个超越欧洲中心主义、具有全球社会观点的概念,并且将其视为在三个互动层面中实现的具超越性的统一概念:一、国家、地区和全球之间的关系;二、中心与边缘的互动;三、现代性和非现代性之间的关系。

由 Stephan Lessenich 领导的法兰克福学派新纲领,是自1923年以来最有抱负的改革转变。它独特之处在于将自身置于全球化的历史经验中,借此界定其结构性问题;此外,它也承诺参与科学、批判性思考和政治行动,以应对欧洲外的社会转型议题。■

來信寄至:

Esteban Torres

<e.torres@em.uni-frankfurt.de>

> 减碳共识

Breno Bringel, Rio de Janeiro State University, 巴西, 以及 Universidad Complutense de Madrid, 西班牙; **Maristella Svampa**, CONICET 以及 Centro de Documentación e Investigación de la Cultura de Izquierdas, 阿根廷



与 Aerocene Pacha 一起飞 (Salinas Grandes 和 Laguna de Guayatayoc, 于阿根廷胡胡伊省, 2020 年)。
来源: Aerocene 基金会和 Tomás Saraceno 工作室。

近年来, 社会生态转型已然成为当代政治、经济议程的核心焦点, 不再侷限于社会运动和科学相关群体中。这涉及到两个问题——首先, 由于迫切地追求减碳, 原先涵括能源、生产、食品和城市等面向的社会生态转型, 似乎有被简化为能源转型的趋势。其次, 则是能源转型该如何进行, 以及相关成本将由谁承担。

能源转型的目标是所谓的「干净」能源, 其由全球北方的大型企业及政府推动, 却为全球南方造成了压迫。许多位于全球边缘的地区, 为了让中国、美国和欧洲淘汰化石燃料能源而牺牲。举例来说: 生产电动汽车的高科技电池, 需要开采

>>

钴和锂，而锂三角（拉丁美洲和北非）便受到很大的影响；中国和欧洲国家建设风力涡轮机，需要大量巴拉木材，这摧毁了当地的社群、领土和生态多样性；要开发太阳能板和氢能等大型设施，就需要大量空间，而过程中人们进行的土地交易，则进一步加剧土地占有现象。

前述的现象，在行动主义和批判研究等领域中越来越受关注，并被称为「绿色剥削」或「能源殖民主义」——在绿色能源转型的过程中，一种崭新的、资本主义的资源剥削和占有形式出现了，其针对（但不限于）全球南方。我们将这套新的资本主义共识，定义为「减碳共识」（decarbonisation consensus）。而能源殖民主义，便是这套共识的核心。

> 减碳共识是什么？

减碳共识是一套新的全球共识，提倡的是将化石燃料导向的能源系统，转型为「再生」能源的零碳（或低碳）能源系统；核心思想则是对抗全球暖化、气候危机，推动以消费电气化与数位化为基础的能源转型。这套共识反映出的，是广为人们接受的某种认知——身处于这样一个面临崩毁、危机的世界，谁又能反对减碳和改善极端气候等追求呢？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思考的并不是要做什么，而是该如何做。

这套减碳共识已经佔据了支配地位，且其主要动机并不是分散能源系统、关爱自然、全球气候正义之类，而是催生新的财政激励政策、减少某些国家的能源依赖性、扩大市场、改善企业形象等等。改变社会代谢的机制，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其中涵盖生产、消费、货物流通和废物产生模式等面向；然而在此意义下，减碳不只是改善社会代谢机制的一环——减碳本身就是目标。虽然人们已经意识到气候危机有多严重，但是在自然资源开采加剧、经济无限增长仍是人们的主要思维方式等情况下，现况下的政策不只无用，还可能对现况造成负面效果。

科技的潜力和创新，以及「绿色商业」、「气候金融」、「自然基础方案」、「气候智能矿业」、「碳市场」等概念，还有各种形式的投资，经常在减碳共识的论述中被强调。总结来说，这项共识所产出

的转型方案，是以商业逻辑为基底，并借由数位化的包装，创造出了新的商品，以及更多复杂的社会和领土控制模式。

随着永续的论述急转弯，全球南方进入了新的环境剥夺阶段，有数百万人类与非人类等知觉生物受到影响，生物多样性受到危害、策略性生态系统也遭到摧毁。全球南方再次成为拥有不竭资源的仓库，供全球北方在能源转型之际，可以策略性地提取矿产资源；同时，南方也成为这个新的「工业革命」的垃圾场，接收了能源转型所产出的废物和污染。

> 绿色殖民主义与双重束缚

减碳共识动员了新殖民生态化的想像与实践，背后弥漫着生态帝国主义与绿色殖民主义的痕迹。举例而言，现在的政府和公司经常使用帝国地缘政治当中典型的「空间空白」概念。同样的概念，过去曾由 Ratzell 的「生活空间」延伸出来，并导致生态灾难、土著族群灭绝，更被用于推动「发展」和「殖民」政策；如今则在投资「绿色」能源时，被用于正当化领土扩张主义。

借此，人口稀少农村地区的大片土地，就成为了适合建设风车或氢能工厂的「空白空间」。企业转型的地缘政治想像，可以说是再现了殖民关系。这样的关系是从某种被强加于南方的、来自北方的压迫；在某些情况下，则是某种「内部绿色殖民主义」，使殖民联盟、国内外菁英的绿色剥削得以可能。在「绿色转型」的名义下，减碳共识也对全球北方的领土带来压力，不过，这和全球化下边缘地区受到的影响比起来，还是相差许多。

此外，减碳共识的实践形式及暂时性，触发许多人，甚至其支持者的不满。思觉失调行为与政策的恶化——或以 Gregory Bateson 的话来说的「双重约束」（double bind）（见其著作《Steps to an Ecology of Mind》）——似乎是文明同时面临多个危机的迹象之一。像化石燃料公司这类人，虽然意识到这些迹象的存在，却还是游说政府，试图提取更多的石油，借此延迟减碳。举例来说，美国总统 Joe Biden 违背了竞选时的承诺，在2023年3月批准了 Willow 计画。此计画的推动，意味着阿拉斯加地区的石油

开发将近一步展开,使得如今已因全球暖化而极脆弱的生态系统,面临更大的威胁。另一个例子,则是欧盟于2022年中选择回归煤炭,并以乌克兰战争加剧了能源危机为借口。

减碳共识透过巴西研究员 Camila Moreno 设计的**碳公制**,侷限了抵抗气候变迁的形式:借由这种测量二氧化碳分子的碳计量公式,减碳共识为国际交易提供了一种货币,使人们误以为已经有人针对环境退化采取行动,掩盖了真正的问题。事实上,地球的自然和生态污染仍持续加剧,不只如此,污染还变成了新的商业领域(例如人们进行碳排放量的买卖)。除非我们能改变这样的动态、破除此种消费模式,否则任何数量的锂或矿物资源,都不足以解决环境问题。

总之,转型不仅是能源结构的改变,如此只会促使不能永续的模式持续存在。减碳共识以企业逻辑为基础,提出了短程的能源转型方案,确保发展计画仍然佔据支配地位,并加速了代谢断层,以维护当代——特别是全球北方与经济最为富裕的部门中——的生活和消费模式。减碳共识提倡的后石化逻辑,促成了一场企业化、科技化、新殖民主义化且非永续的能源转型。

> 重演历史的资本主义共识:不可避免性、企业控制与剥削

从社会历史过程的角度审视减碳共识,可以发现其特征与过去的资本主义共识(即华盛顿共识和商品共识)极为相似。首先,上述共识皆有不可避免性论述,声称现况下没有其他的替代方案。举例来说,商品共识的前提,是人们已经接受,世界各地的原料需求都不断增长,而剥削则是必然的结果。同样地,现在的减碳共识也试图构筑这样一种观念——面对气候变迁的唯一、实际的方法,就是企业化的能源转型。

第二,上述共识都可能导致权力大量集中于非民主行动者身上(如大公司、金融机构和国际组织),从而使民主治理不再可能。这样的趋势有两个影响,一方面,企业佔据了治理者的位置——COP作为联合国气候变迁纲要公约的最高机构,应该要是由多方势力所组成,但类似机构却成为了绿色资本主义的商业展览,以维持既存的北方—南方能源权力关系为目标。另一方

面,不管是在全球供应链的起点还是终点,权力也越来越被大公司所掌握。

第三,两者皆试图扩展资本主,且有许多实际作为,例如:推行旨在控制、剥削和出口自然资源的大型计画。为达成此目标,其借由法律基础来确保资本的「法律安全」,最大化企业的盈利。举例来说,欧盟正谈判的新双边贸易协定,便纳入了能源和原料的章节;更于最近提出了关键原料法规。两者表面上是为了确保欧洲有充足的关键原料,然而,正如一份**SOMO报告**指出,这项措施没办法达成这个目标,反而会加剧对人权和环境的风险、破坏合作国家的经济动态,并深化富国的非永续消费。

> 新特征:帝国竞争、能源安全与气候殖民主义

除了上述相似的部分,减碳共识也有一些新的特性。如今,在一个多极世界中,存在着相互竞争的帝国,这也导致减碳共识的重要特征之一,是更加复杂的新殖民关系。有直接取得重要矿物需求的,不只是缺乏这些矿物的欧盟。而中国这边,即便拥有这些矿物,其仍在全球南方中处于极佳的位置,并于近二十年间持续地将资源投入剥削当中,这和美国、欧洲的形式非常不同。

中国正试图和拉丁美洲与非洲国家建立一种新的依赖关系,在这种关系里,中国成为了这些国家的主要贸易对象。中国的投资是长期的,并涉及不同领域,例如农企业、矿业、石油或与剥削相关的基础设施等等。值得注意的是,在科技转移,尤其是绿色转型方面,中国倾向于使用最前沿的科技,这有时也包括中国的劳动力。

就连美国也参与在这场帝国主义的角力当中。虽然美国国务院的声明,并没有提及这些议题,不过美国南方司令部的负责人 Laura Richardson 曾经在多个场合明确指出,南美洲的水、石油、锂等资源对美国说是有战略利益的。另一件值得提及的是,作为多极世界中佔据支配地位的行动者,俄罗斯在能源转型领域的这场角力中,影响力是完全不及前述大国的。

三种共识间的另一个差异,是国家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我们知道,华盛顿共识主张极小化国家,而商品共识则主张国家与跨国资本结盟的同时,仍具

有一定的协调功能。相比之下，减碳共识似乎展现出一套新的规划型国家主义，其中，国家更具有生态企业的特性，结合了绿色转型、促进公私基金和自然金融化等措施。一方面，政府机构和国家有时会倾向于支持私人企业或与之合作，以实现绿色转型的目标；这种情况下，公共部门似乎在一定程度上屈从于私人企业的利益，导致公共和私人之间的紧密关系。另一方面，这样的情况也可能引发激烈的抗议活动，此时国家便会试图借由促进生态社会转型、鼓励权力分散和去中心化，重建相对自主性。

虽然商品共识和减碳共识都具有采矿逻辑，但两者需要的产品和矿物并不完全相同。在商品共识中，主要受到关注的是食品产品、烃类（石油、天然气等）以及一些金属矿物如铜、金、银、锡、铝土岩和锌；脱碳共识则不同，除了上述传统矿物外，更将重点放在能够实现能源转型的关键矿物，例如锂、钴、石墨、镱以及稀土元素。这两种共识都涉及矿物的开采和

出口，但减碳共识的特殊之处，在于推动者会试图透过论述来正当化其行动。他们声称，这种绿色采矿是永续的，且是面对气候议题的唯一可行方案。

简而言之，我们需要了解近年来气候和生态问题经历了怎样的意义转变。除了过去的那些敌人，减碳共识正逐渐长程一个更加复杂且精细的体系，我们必须透过社会运动，以及找寻其他替代方案，来应对这个挑战。■

來信寄至：

Breno Bringel

<brenobringel@iesp.uerj.br>

/ Twitter: [@brenobringel](https://twitter.com/brenobringel)

Maristella Svampa

<maristellasvampa@gmail.com>

/ Twitter: [@SvampaM](https://twitter.com/SvampaM)

> 北非的能源转型：殖民主义、剥夺与征用

Hamza Hamouchène, Transnational Institute 和 Algeria Solidarity Campaign, 阿尔及利亚



32

摩洛哥的瓦尔扎扎特太阳能发电站。来源：iStock，2022 年。

某些再生能源的转型措施可能具有剥削性质，并连带支持了现有的剥夺、依赖和霸权体制。我将举北非地区（尤其是摩洛哥）的几个例子，以显示能源殖民主义是如何透过绿色殖民主义或绿色掠夺被再制。

摩洛哥政府订定了一项相当有野心，同时也值得肯定的目标：2030年，国内再生能源能在其能源结构中佔比达到52%（按装置容量计算）。然而，若我们追求的是「公正的转型」而非单就形式上的转型，那我们就需确保社会中的贫困人口和边缘群体得到实质受益。我们需注意到，这个计画若使得他们在社会

>>

经济上的弱势状况更加恶化，那我们即需对计画进行批判性的评估。

2016年瓦尔扎扎特太阳能发电厂开始运营时，正值马拉喀什举行气候谈判(COP22)的前夕。此发电厂被誉为世界上最大的太阳能发电厂，摩洛哥国王也因此被归类为再生能源的支持者。然而深入了解后，我们发现此立意良好的计画的另一个面向：首先，这个佔据 3000 公顷的太阳能发电厂建在阿马齐格农牧民社区的地上，却未曾经过居民的同意，形成了土地「绿色抢夺」的状况。其次，此项目的建设是与世界银行、欧洲投资银行等受私人利益团体所掌控，并与他们签订了高达 90 亿美元的债务协议而实现的项目。摩洛哥政府原先就背负着相当沉重的债务，而现在债务的负担只会更加繁重。第三，尽管这个计划宣称自己是绿色环保的，但实际上并非如此。使用聚光太阳能(CSP)需要大量水资源进行冷却和清洁太阳能的电池板。因此，显而易见地，若是要在像瓦尔扎扎特这样的半干旱地区挪用饮用和农业用水的资源，这样的决策是**相当不合适的**。

「Noor Midelt」专案是摩洛哥太阳能计画的第二阶段，期望能提供瓦尔扎扎特更多能源。此计划融合了混合型的聚光太阳能热发电和太阳光电系统技术；第一阶段预计可提供800兆瓦的电力，使其成为全球最重要的CSP和PV技术结合的太阳能项目之一。2019年5月，摩洛哥太阳能局招揽了由法国的EDF Renewables、阿联酋的Masdar和摩洛哥的Green of Africa组成的企业财团联合体，负责建造和运营此设施，合约为期25年。截至目前，**此项目**已签署20多亿美元的债务合约，包括与世界银行(WB)、非洲开发银行(AfDB)、欧洲投资银行、法国开发署(AFD)和德国复兴信贷银行(KfW)的协议。

计画于2019年启动，预计于2024年正式委托于委任公司进行。Noor Midelt 太阳能综合计画位于摩洛哥中部的上穆卢亚高原，佔地4,141公顷，距离Midelt镇东北方约20公里。该地区由Ait Oufella、Ait Rahou Ouali 和 Ait Massoud Ouali 三个少数民族群的农业社区管理约2,714公顷的公有土地。同时，约1,427公顷的土地被宣布为林地，并由这些社区管理。然而，根据国家法规规范，这些居民的土地可能被征用为提供公众利益的政府用地。行政法院于2017年1月做出利于摩洛哥太阳能局的这项征用决定，法院判决也于同年3月公开。

> 殖民主义式的环境叙事

这让人联想到一直以来的殖民主义环境叙事，这种叙事将被征用的土地称为边缘化和未充分利用的土地，因此可用于投资绿色能源。2018年，[世界银行的研究](#)再次强调「这片土地由于缺水，其沙质干旱的地形只允许小灌木丛生长，不适合农业发展」；但事实上，与上述说法类似的呼吁在2010年左右，就已在对于瓦尔扎扎特工厂的宣传被引用。对此，当地一位居民却**表达了相反的看法**：

「计画人员说这是一片荒芜的沙漠，但对这里的人们来说，这不是沙漠，而是牧场。这是他们的领地，他们的未来就在这片土地上。你们夺走了我的土地，也就夺走了我的氧气。」

世界银行的研究报告更进一步指出「该计画的土地征用对当地社区的生计，并不会造成影响」。然而，数百年来一直在这片土地上放牧的西迪阿亚德(Sidi Ayad)游牧部落却反对这样的看法。一位年轻的牧羊人 Hassan El Ghazi 在2019年向摩洛哥 ATTAC 组织中的一位社运人士**表示**：

「我们的职业是放牧，现在这个项目佔据了我们放牧的土地。他们在项目中没有僱用我们，却僱用了外国人。我们原先居住的土地被佔用了，他们摧毁了我们建造的房屋。事实上，我们是受到压迫的，Sidi Ayad 地区也同样被剥夺该有的权利。我们的孩子受到压迫，他们和我们先祖的原有的权利消逝殆尽。我们成为不识字的『文盲』，我们的孩子也没有上过学……原有的道路和小径都被切断……最终，我们成了不被看到也不被关注的人们。对他们而言，我们根本不存在。我们强烈呼吁政府官员们关注我们的处境和使用这个地区的权利。在如此的政策下，我们犹如隐形人。我们宁可去死、宁可去死！」

> 抗议与抵抗

在这样一无所有、苦难、低度开发和充满社会不正义的背景之下，2017年以来，西迪阿亚德民众就曾透过多次抗议活动表达他们的不满。2019年2月，他们举行了一次公开的静坐示威。这场示威活动使得 Union of Small Farmers and Forest 联盟的成员 Said Oba Mimoun 被捕，并被判处 12 个月的有期徒刑。

同样，一位长期支持西迪阿亚德部落斗争的工会成员 Mostepha Abou Kbir 描述了这片土地如何在未经当地社区同意的情况下被强硬佔据。目前，这片土地被封锁并禁止任何人接近。他将摩洛哥国家的大型开发项目与西迪阿亚德地区缺乏基本基础设施这两个项目进行了比较；此外，他也指出佔地和资源掠夺以外的另一个层面——为了支持这些大型计画（Midelt 太阳能发电厂将从附近的 Hassan II 大坝供水），Drâa-Tafilalet 地区的水资源不只遭到破坏，当地社区却也未从中受益。在计划案的开发过程，小牧民被驱赶离开，当地导致了生计困难；然而，计划案获益的财富却是集中在少数人手中。此外，再加上家畜市场的商品化与长期的干旱，以上因素都将加剧对此牧民社区生计的威胁，使得他们在社会上的处境更剧边缘化。

不仅西迪阿亚德部落对该计画有许多关注，推行 Soulaliyate 运动的妇女也长期要求 Drâa-Tafilalet 地区有权获得土地使用的权利。此外，居民还应该要得适当赔偿，因为，他们的祖传土地被强硬征收去建造的太阳能发电厂。「[Soulaliyate women](#)」指的是生活在摩洛哥集体土地上的部落妇女。而 Soulaliyate 妇女运动始于2000年代初，是源于对部落的集体土地被大量商品化和私有化之事件。部落妇女要求在其土地私有化或分割时享有平等的权利和份额。然而，这运动却受到政府当局百般恐吓，甚至逮捕围攻群众。有幸这场与高举平等和正义旗帜的运动在来自不同地区的妇女团结和努力对外之下，已蔓延至全国各地。

只是，尽管这些问题和不公正现象真实存在。但在君主政体、镇压政权及其宣传工具的保护下，此计画仍如火如荼地持续进行。这种将社会生态成本外部化，并将其在空间和时间上转移的逻辑其实即是资本主义榨取的驱动力。更难过的是，这样的逻辑似乎并没有终结的迹象。

> 西撒哈拉的绿色殖民主义与佔领

摩洛哥的瓦尔扎扎特的太阳能发电厂和 Noor Midelt 等计画，被称为「绿色掠夺」，亦即为了所谓的环保目的而侵占土地和资源。无独有偶，在西撒哈拉被佔领土上所进行的类似再生能源（太阳能和风能）的计画，则被贴上了「绿色殖民主义」的标籤，因为这些计画不顾当地住民的反对，直接掠夺与佔领他们的土地来实施计画。

绿色殖民主义可以被定义为将掠夺和剥夺（以及对他人的非人性化）的殖民关系。而此项议题也可以延伸到再生能源的绿色时代，事实上，这只是将负面的社会环境成本转移到周边国家和社区。与过往相同，全球能源密集生产和消费维持相同模式，而这样的模式一样会造成不平等、贫穷和剥夺；这样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也从未改变。唯一有变化的只是能源来源不同，由化石燃料转向绿色能源。

目前，被佔领的西撒哈拉地区有三个运作中的风力发电场，而第四个风力发电场正在波哈多角建设中，此外，另有几个风力发电场在规划阶段。这些风力发电场的总装置容量超过1000兆瓦，有部分由摩洛哥王室控股的公司 Nareva 投资组合。摩洛哥国营磷酸盐公司 OCP 开采 [西撒哈拉](#) 布克拉不可再生磷酸盐储量所需的能源中，约95%由风车产生。例如50兆瓦的 Foum el Oued 发电厂配备22台西门子歌美飒（Siemens）的风力涡轮机。这些涡轮机自2013年开始运作，为再生能源生产做出不少贡献。

2016年11月 联合国气候谈判 COP22 的期间，沙乌地阿拉伯的 ACWA 电力公司与 MASEN 签署了一项协议：未来他们将计划开发一个综合的太阳能能源项目。此项目会由三个光伏太阳能电站组成，总装置容量达到170兆瓦。然而，令人担忧的是其中两座电站（目前已投入运营，总计100兆瓦）并非位于摩洛哥国内，而是位于被佔领的土地上（分别是 El Aaiún 和 Boujdour）。此外，也此计划也预计在达克拉（Dakhla）附近的 El Argoub 建立第三座太阳能发电厂。这些再生能源项目，似乎受到外国资金和私人公司的共谋，深化了摩洛哥与被佔领土之间关联性，且加强了侵佔居民土地的状况。

上述背景下，我们急需深刻审视再生能源过渡，并注意「干净」、「可持续」和「碳排放减少」等表层宣传口号以外的议题。将化石燃料从可再生能源过渡，且无论任何形式可再生能源的实施与转变都值得鼓励这件事，以及将是所有项目和围绕它们的炒作合在一起讨论，绝对是个严重的误解。我们必须明确指出：当前的气候危机不是由化石燃料本身引起的，而是因为化石燃料被用于供养资本主义。并且，这种使用方式是不可持续且破坏性的。因此，实现绿色和公正的转型需要根本性地改变全球经济体系，使绿色能源非殖民化。因为事实上，这样的资本主义体系在社会、生态和生物层面都不符合我们当前的需求。■

來信寄至：

Hamza Hamouchène

<hamza.hamouchene@gmail.com>

Twitter: [@BenToumert](#)

> 非洲的绿色与内部殖民主义

Nnimmo Bassey, Health of Mother Earth Foundation, 奈及利亞



35

非洲的采矿业。来源：iStock, Africanway, 2012。

绿色殖民主义是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殖民主义的延伸和融合，其深层扎根被巩固于殖民主义的遗毒下。这种形式的殖民主义在非洲生根，塑造了当地领导人对国际遗产保护体系的信仰。这些领导人以此概念为基础推广绿能，但实际上却是为了谋取自身利益。殖民主义的概念中除了对于有形的殖民地的保护之外，也灌输当地菁英一种观念：以国内天然资源和劳动力，对外招募外国经济体的投资以换取现金、使当地经济活络。新殖民主义的国家即采用此模式，寻求愿意让外国投资的地区，并对此国家剥削劳工和自然资源。并且，他们以早已设置好的外汇汇率，在不经讨论的状况下自行决定购买劳动力与自然资源之金额价值。

>>

由殖民地的农业生产将粮食生产转向了经济作物的这个面相，可以窥见当地陷入外汇绝境的例子。如此的产业转型，延续了殖民时代的奴隶制下之剥削性农业体系。直至今日，种植农业仍生产出口作物，这样的土地掠夺剥夺了农民替社区生产粮食的可能性。更复杂的是，除了为外部市场提供食品，农业用地和单一作物现在也被供给成为生质燃料或生物能源的材料来源。无论是农业、矿业或化石燃料领域，非洲的国家领导人追求却只是外汇，然而外汇的汇率却非由他们制定。

殖民主义和后殖民时代建立的结构大大改变了非洲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动态。殖民主义在这片土地播下了寻租的种子，而国际金融机构如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则浇灌了这些种子。债务也成为一种工具，改变了各国发展的想像，并迫使各国更放宽宽限，也加剧了殖民母国资源掠夺的程度。各国政府被迫还债，以满足进口需求，并松绑跨国公司的入国注资的经济条件，其中包括：税收减免、劳动力配额以及将其交易中的所有利润汇回殖民母国的自由等等。此外，被殖民国也与这些外资公司建立了不对等的夥伴关系，导致他们无法实施严格的监管。如前所述，政府的不情愿和无力管控公司的总总行为都已经导致了生态的破坏性开发，在一些被开发的地区导致了死区的出现。

自由贸易区或特别经济区的建立，事实上也有助于巩固他国的自由剥削。其中，出口加工区是自由贸易区的一种类型，发展中国家政府经常为了促进工商业出口而设立。许多国家认为这样的政策，对吸引外国投资起了相当大的作用。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报告，38个非洲国家设立了超过200个经济特区。此外，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也指出，至少还有56个经济特区正在建设中，而其他的则仍处于早期开发阶段。据了解，[非洲已用于经济特区的土地面积](#)达约15万公顷，同时已吸引了超过26亿美元的投资，主要聚集于农产品加工、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发展。

榨取外汇的制度是一种无止境、只会为人类或地球带来负面价值的消耗故事。自圆其说的人权原则和实际上不透明的倡议活动，只是在帮助企业为其公司计画透过绿色能源等公司政策价值洗白，实际上，这些公司联盟且透过腐败的政客输出了更多对于人类价值和地球永续毫无帮助的污垢。Frantz Fanon 在其经典著作[《地球的悲哀》](#)中早预见到这样不幸的局面。他指出，殖民主义的目的是让人们看到其开采和出口的自然资源，从而满足母国工业的需求；殖民地的特定地区变得相对富裕，只是微不足道的附带红利。然而，殖民地的其他地区却走上了不发达和贫穷的道路，或说，更深陷于不发达和贫穷中(第106页)。

Fanon 看见殖民结构如何分裂国家、扩大主体性，阻碍了非洲的团结。他说明这些国家的政治菁英将自身视为国家机会的创造者，将殖民母国在本国的进驻视为进步的动力。这也就解释了为何现任领导人如此固执地坚守开采化石燃料和其他矿产以获取出口／现金的立场，因为，这对于他们来说是一种无法协商退让的权利。因此，如此的情形也说明，国内的生态灭绝必须被接受，就犹如不打破鸡蛋就做不出欧姆蛋。

然而，我呼吁贪婪开采、发展土地的行为，需被彻底地反思与审视。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透过其恶名昭彰的结构调整计划，强行削减包括医疗、教育和经济支持在内的社会服务的资金，这种殖民方式操纵颠复了常理、逆转了进步、制造了贫困并深化了不发达地区所遇的困境。这些机构的负面影响突显了，我们有必要从生态社会主义和反殖民主义的角度密切关注权力的不平等。

> 化石燃料争夺战

在争夺石油和天然气的过程中，各个非洲国家的领导人只看到了本国从快速发展项目，从而迅速获益的机会。他们的论点是扩大生产将增加人民获得能源的机会，然而这是一种虚伪的说法，因为[数十年的开采](#)只带来了生态破坏和更多的贫穷。

固守殖民体系下的贸易系统被称为「巫毒经济学」(voodoo economics)。这样体系下，现金透过少量的发展与原料的转化流入本国，促使非洲国家极度依赖租借主义，亦即透过跨国公司取得国家收入，并且，这样的发展也同时促使对殖民母国依赖的根深蒂固。毫不意外地，利比亚、阿尔及利亚、加蓬、乍得、安哥拉和刚果共和国，[石油收入](#)皆至少佔国内生产毛额 20%。除此之外，尽管石油和天然气仅佔奈及利亚实际 GDP 的6%，但却佔外汇收入的95%、政府收入的80%。非洲联盟国家集团利用2022年在沙姆沙伊赫举行的 COP27 气候谈判，[游说扩大化石燃料的生产](#)，以便像富裕国家一样从丰富的自然资源中获益。然而，他们的论点缺乏对外汇拨款和外部企业体制的批判性审查，而正是这些机制使富裕国家得以从资源中大量获益。

非洲资源掠夺的根源与殖民主义紧密相连。因为殖民主义奠定了免于对外、对内追究责任的基础，使人们不必担心受惩罚。掠夺和免责日益猖獗，有时甚至伴随着残暴武力。这使非洲的自然资源丰富和冲突的地域几乎完全重叠。开发活动通常受到国家军队、安全人员和雇佣军的支持，实际上是在军事护盾的掩护下进行；他们对人权和集体权利是漠视不顾的。

>>

政治生态学家 [Patrick Bond](#) 以法国、南非和卢安达的行动描述了在全球暖化背景下,这些国家无止尽地进行石化燃料开采的不安局势。他指出:「目前法国国家权力对于非洲此产业的发展,仍是遵循着传统模式在背后操作发展。他们透过石化燃料的开采,对发展中国的经济、政府、社会和环境造成侵蚀。」而为了支持此观点,他提到了「2021年,艾曼纽·马克宏(法国总统)在卢安达和南非军队的协助下,坚决采取军事干预行动以维护 Total 企业在莫桑比克共和国价值 200 亿美元的天然气。此外,普利托利亚(Pretoria)的次帝国主义角色同样解释了为何自2010年中期以来,法国不遗余力地支持与 Total 企业结盟的新石油大亨,以开采大量天然气储备,并透过地震爆破技术寻找新矿藏。」

Bond 继续指出,自2021年以来出现了两种反抗石化帝国主义和次帝国主义复兴的力量。首先,暴力冲突动摇了法国石油和天然气巨擘 Total 公司的政策;另一种是聚集于南非海岸线的环境和社会动员,令该国政府深感震惊。

法国作为一个对非洲法语国家保持严格殖民控制的国家,其所扮演的角色难以令人忽视。尽管法国已经在其领土上禁止使用压裂技术以及原油开采,同时也禁止石化燃料广告。但是,他们最大的石油和天然气能源公司仍持续在其他地方开采。其中最恶名昭彰的事件是莫桑比克共和国的德尔杜加角省,在COP27会议在沙姆沙伊赫举行时,第一批化石天然气就是从这里运出的。[第一批](#)化石天然气的运输时间和开会时间重叠的事件表明,事实上,暴力并没有阻止非洲资源的开采。赖比瑞亚的「血钻石」事件、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持续动盪就是最好的例证。

Total Energies 是德尔杜加角最重要的天然气开采商之一。Afungi 的液化天然气(LNG)园区是专为化石燃料业务而建。而为了修建通往园区的长达70公里的道路,超过550个家庭被迫搬迁。那些沿海捕鱼社区被迁移到距离海洋有超过10公里的「重置村落」,被迫切断了他们与海洋的联系,甚至剥夺了他们的农田、渔场、生计来源、文化遗产以及对沿海社区至关重要的一切。德尔杜加角拥有非洲大陆[最大的三个液化天然气项目](#):莫桑比克液化天然气项目(Total Energies 公司,前身为 Anadarko公司)价值200 亿美元、珊瑚液化天然气(Coral FLNG)项目(埃尼公司和 ExxonMobil公司)价值47亿美元、马布多液化天然气计划(ExxonMobil 公司、埃尼公司和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价值300亿美元。德尔杜加角可能是非洲大陆上最严重的企业灾难之一。

马布多2022年11月,环境正义组织主持了一场关于企业不受制裁问题的会议,参与者包括来自莫桑比克各地的100多名成员。会议期间,一位社区代表痛苦地表示:「对我们而言,跨国公司不是带来了发展,而是带来了耻辱。用「殖民主义」取代「跨国公司」,就能将这个剥削的图像变得更加完整且被看见」。另一位与会代表也提问:「破坏我们的土地,还能称为发展吗?」他接着又反问:「难不成这就是我们所期望的发展吗?」

殖民主义,他们对人民和土地的不尊重是根深蒂固的;无论其表现为何,黑色、蓝色又或是绿色?他们都从未与人民协商。在这样的游戏中,Total 石油天然气公司开展业务的地区都经历了社会不平等的恶化和社会的分裂。讽刺的是,唯一的共通之处大概就是这些地区通常皆被称为「Total 地域」。

來信寄至:

Nnimmo Bassey

<home@homef.org>

Twitter: [@NnimmoB](#)

> 南南合作：促进生态社会 能源转型之宣言*



Manifesto from the Peoples of the South:
FOR AN ECOSOCIAL ENERGY
TRANSITION

来源：Pacto Ecosocial e Intercultural del Sur。

经过新冠疫情在全球两年多来的大流行，再加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状况，全球正进入一种「新常态」的状态。这个全球状况反映出各种危机的升温，包括社会、经济、政治、生态、生物医学和地缘政治等危机。

此外，环境问题日益严重、日常生活甚至呈现了军事化的特质。全球许多人们获得高品质食品、干净用水以及可负荷的医疗保健的状况更加艰难。越来越多的政府走向独裁统治的趋势。富人与特权阶级愈益富有、强大，而未受监管的新技术只会进一步推动这种不平等的趋势。

而不公平状态的根源——资本主义、父权体制、殖民主义以及各种基本极端主义——都加剧了目前

>>

全球的不平等困境。因此，我们迫切需要讨论和实施新的生态社会转型和变革，并且，这些愿景应该具备性别平等、永续性以及普遍性的特征。

> 我们的诊断

在这份《南方人民宣言》中，我们认为全球南方面临的问题，与全球北方以及崛起之大国（如中国）所面临的问题并不相同。这两个领域之间的权力不平衡不仅受长期受殖民遗毒影响，还因新殖民主义的能源模式而愈加严重。在气候变迁加剧、能源需求不断增长以及生物多样性丧失的背景下，资本主义的核心国家继续扩大对边缘国家在自然资源和廉价劳动力方面的掠夺。众所周知的采矿模式不仅持续存在，北方地区对于南方的生态剥夺债也不断增加。

最新近况，全球北方正在进行所谓的「干净能源之转型」，而不幸地这只给全球南方带来了更大的压力。他们被迫生产钴和锂以用于制造高科技电池；他们不断伐木以制造风力涡轮机；他们开发土地以建造大型太阳能电池阵列，并建造新的基础设施以支持氢气大型计划。我们会发现，这种市场驱动富裕国家的去碳化策略，在产业依赖全球南部的状况下，却反而成为新一轮环境掠夺，并对数百万妇女、男子和儿童的生计一直到产生非人类生命皆产生了了剧烈影响。在这样的状况下，全球南方再次成为牺牲区，犹如成为全球北方国家取之不尽、用之不尽的资源百宝袋。

事实上，全球北方的优先事项是确保全球供应链，尤其是关键原材料的供应，同时他们还必须慎防某些国家（如中国）垄断他们的供应链。举例来说，最近七国集团（G7）贸易部长呼吁透过国际合作、政策和金融措施，包括透过世界贸易组织推动环境产品和服务贸易，以建立负责任、可持续和透明的关键矿产供应链。此外，全球北方正积极推动与全球南方签署更多的贸易和投资协定，以满足其对资源的需求，特别是「干净能源之转型」所不能或缺之资源。然而，这些旨在减少贸易和投资障碍的协定，可能透过投资者与国家争端解决机制（ISDS）使国家面临法律诉讼风险，从而保护和加强了企业的权力和权益。全球北方正是利用这些协议来控制「干净能源之转型」，进一步巩固了新的殖民主义。

与此同时，南方国家的政府陷入债务陷阱，不得不借款用于建设工业设施和发展大规模农业以满足北方的需求。为了偿还这些债务，政府必须不断开采更多的资源，形成了一个不断加深的的不平等恶性循环。目前，虽然减少北方的消费并非轻而易举之事，但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减少对石化燃料的依赖，

因为，这只会加深对自然资源的压力。此外，尽管全球在推动能源转型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但北方仍然未能承担起解决其历史上欠南方，以及他们不断积累的生态债务的实质责任，而这种责任往往只说说而已。

仅仅改变能源结构是不够的。从生产、分配到消费和浪费，整个能源系统都必须经历彻底的变革。单纯地使用电动车取代内燃引擎车是远不够的，因为我们需要重新构思整个交通模式，以降低能源消耗，推广永续的选择。此外，我们不仅需要改善核心和边陲国家之间的关系，还需要改善国家内部、菁英和公众之间的关系，使制度与资源分配更加公平。全球南部国家存在腐败的精英特权阶层，他们透过从资源开采中获益，并制造了不公正的制度、资源分配以及加剧了经济的不平等，也同时践踏人权和环境保护。为了应对这些错综复杂的挑战，单纯依赖技术还不够，政治方面也是我们必须迫切处理的层面。

> 全球南方的转型正义

作为来自全球南方不同国家的活动家、知识分子和组织，我们呼吁全球各地的推动转型的运动者全身心地致力于基进、民主、性别公正、再生和基层导向的生态社会转型，并且改变能源部门以及依赖大规模能源投入的工业和农业领域。正如气候正义运动中所提及的「转型是无可避免的，但正义并非如此」。

截至目前，我们尚有时间开始迈向公正和民主的转型。我们可以摆脱新自由主义经济体系，迈向维护生命，将社会正义与环境正义融为一体；更甚，将平等、民主的价值观与灵活、全面的社会政策相互结合；最后，恢复地球所需的生态平衡之方向前进。但若要实现此目标，我们需要更丰富的政治想像力来建构一个公正、尊重我们共同家园的乌托邦式理想社会。

能源转型应成为综合愿景的一部分，以解决能源资源分配极不平等的问题，从而促进能源民主。它不应该过度强调大型机构，如：企业农业和大型能源公司，或是基于商业市场的解决方案；相反，它应该积极强化民间社会和社会组织的韧性。

> 声明要点

由此，我们提出以下八点建议：

1. 由全球北方企业主导的并受到全球南方众多政府所接受的能源转型计划，必然会扩大牺牲全球南方

>>

更多的区域。能源转型计画使殖民主义遗毒、父权体制和债务陷阱持续存在。我们呼吁，能源是不可剥夺的基本人权；能源民主应成为我们共同努力的目标。

2.此外，我们也呼吁全球南方国家的人民，应拒绝以新形式能源「绿色转型」为名的新殖民主义。因为，它从来不是能解决能源问题的方案。我们特别呼吁南方各国人民继续与政府和企业进行政治协调，且与身在北方的批判团体共同结盟对抗不义。

3.为了减轻气候危机造成的破坏、促进公正和大众化的生态社会转型，我们要求北方国家偿还对南方的生态债务。有鑑于全球北方对气候危机和环境崩溃所需要承担的不成比例的责任，这意指或许我们需重新思考给予全球南方的赔偿制度。我们建议，这项制度应囊括资金和适当技术的转让，并考虑取消全球南方国家的主权债务问题。我们再次呼吁：北方国家应该对于当地原住民、弱势群体和社区因采矿、大型水坝和肮脏能源项目等遭受的损失进行赔偿。

4.我们反对本国透过水力压裂法通过扩张碳氢化合物的使用。此外，欧盟最近竟然宣布天然气和核能为「干净能源」，我们同样极力反对欧盟这种虚伪的言辞。这样的立场在今天得到了许多社会部门和组织的支持，正如厄瓜多尔在 2007 年的「亚苏尼倡议」中已经提出的论点。我们主张将石化燃料留在地下，同时创造必要的社会和劳动条件、摒弃榨取主义，走向属于后石化燃料时代。

5.我们同样反对「绿色殖民主义」的土地掠夺。并且，它因建设太阳能和风能发电场、滥采关键矿产，以及推广蓝氢、绿氢和灰氢等技术的「伪解方」去封闭、排斥、暴力、侵占和固化南方国家。而这样的状况从过去到现在不曾改变，已成为南北能源关系之特征；对此，我们再次强调：南方国家所面临的剥削和困境，在生态社会转型的时代不再可被接受。

6.我们要求真正地保护这些环境和人权的捍卫者，特别是一直站在抵制榨取主义的最前线的当地原住民与妇女族群。

7.我们的基本目标包括，社区应该自立拥有和经营替代性、分布式、公平分配的可再生能源计画。如此一来，则得以消除全球南方和北方部分国家在能源问题上的不足。

8.最后，我们公开谴责那些希望榨取和开采更多位于边陲国家的石化燃料之国际贸易协定。我们必须终止由跨国公司控制的贸易和投资协议，因为这些协议最终会促进更多的开发，强化新殖民主义。

我们的生态社会替代方案建立在无数挣扎、努力、策略、建议和社区倡议的基础上。我们的宣言与原住民的生活经验、批判性观点以及全球南部的其他地方社区、妇女和青年相联系。其灵感源于自然权利(buen vivir、vivir sabroso、sumac kawsay、ubuntu、swaraj)，以及公有领域(the commons)、关怀经济(care economy)、生态农业(agroecology)、粮食主权(food sovereignty)、后采掘主义(post-extractivism)、多元(the pluriverse)、自治(autonomy)和能源主权(energy sovereignty)。最重要的是，我们呼吁实现基进、民主、普遍、性别正义、可再生和具全面性的生态社会转型。

跟随 [Ecosocial and Intercultural Pact of the South](#) 的脚步，本宣言提出了一个不断发展、且活跃的平台，邀请您加入我们共同为这些理想奋斗、帮助我们创造集体理想愿景与解决问题之方案。■

* 这份《Manifesto of Peoples of the South》历经一年的书写时间，由来自全球南方(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的社会运动者、知识分子和组织在多次对话和讨论后所共同撰写。

> 革新威权(与威权主义)理论的必要

Kathya Araujo, Universidad de Santiago de Chile, ISA社会学理论研究委员会 (RC16) 成员

来源: [Freepik](#)



威权——以及如何行使威权——是如今极为热门且迫切的议题。这个议题涉及诸多领域,包含:威权主义政权的社会支持、威权主义自身、教师如何在校园中施展权力时陷入困难、都市空间的管理困境,以及家庭关系紧张等等。有鉴于近来的社会与政治现象,以及其隐含的风险与紧迫性,我们应该要善用社会学精细的视野,借由适当的工具来处理这项议题。至今以来,以威权行使为主题的社会学研究并不多,因此,革新威权的理论概念颇为必要。

早在许久之前,威权这个主题就已经是社会理论界的焦点,而这方面最具影响力的学者当属韦伯。他指出,威权背后的基础,是对于正当性的信念——这对于后续的社会理论和实证研究皆有深远影响。然而,我并不认为我们应该要继续以这种理解为尊。原因有两点:首先,威权由正当性而生的理论,只能部分地反映当今的社会现象;其次,这项理论只能解释某些社会现实中的特定威权行使。

我们先谈谈第一个原因，即这项理论于当今社会的适用范围。我们知道，韦伯认为，威权的核心驱动力，是对于指挥或行使权力之正当性的信念。而这样的信念，使得权力行使能够得到共识，也是权力稳定和持久的基础。韦伯认为阶层制度是稳定、相对持久的，且威权的行使在某种程度上是具有制度、传统或普遍价值观支持的。这种威权具有下列特点：a) 与阶层制度的稳定与持久紧密连结；b) 服从是立足于自我与命令之间的稳定关系；c) 以群体间（如男性相较于女性、成人相较于儿童等）相对稳定的权力关系为基础；d) 主要以个体关系的形式施展；e) 受到社群成员间的中介物，以及社群成员与世间万物间的中介物支持。

> 挑战经典威权理论模型

有一些开创性的思潮，对于这项理论模型提出了挑战，也深深地影响了人们如何理解阶层与威权。我将简要提及其中五个思潮。

第一股思潮与道德秩序、信仰和价值的多元化有关；其使得共同、普遍的信念受到削减，理论中所提及的、威权背后的支持基础也随之减弱。

第二股思潮，则是持续扩展、深化平等与自治的规范性原则。这项进程的结果之一，是人们对于阶层制度及其稳定性与持久性——即韦伯理论中的解释性假设——产生了更多质疑。

第三，是个体化的程度日渐提升，人们越来越不愿意屈从于他人的意志。强调个体独特性的风潮，与个体之间相互服从有着明显矛盾。因此，自我与命令之间的关系不再，正当性的理论基础也随之动摇。

第四，群体间的权力分配变化，也冲击了传统阶层结构及其管理手段，例如父权威权模式。这同样削弱了阶层制度背后的支持力量，使得冲突和争议更加剧烈。

第五股潮流与科技发展有关。科技发展促使事实性的威权原则出现，关系性的威权原则于是受到挑战。于是，韦伯于其理论中有关关系性的假设，与现实之间出现了些许落差，医生或教师等权威人物的中介作用，也因这项原则的出现而遭受质疑。

简而言之，这些新的思潮使得我们对于威权有了新的认知，也动摇了韦伯理论的诸多前提。

> 重新检视以正当性为基础的威权理论

我们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检视这项理论，以及上述潮流带来的社会历史变迁，所引发的挑战。透过[智利的个案研究](#)，我发现行使威权的方式不只一种；而不是每种方式都符合正当性威权理论的解释。

一直以来，智利的威权行使较少如韦伯说的那样，存在有共识的服从；更不涉及正当化——即强化正当性信念——的现象。大多时候，威权的基础反而是由威权行使人借由向他人证明自身有能力使人屈从，来策略性地使人服从。换句话说，威权是否得以存续，得看威权行使人的行为能否展现效果。

这样的案例，很少能达成人们自发地认同于威权的状态，也因此，服从经常不是自发的，而只是策略评估后的务实选择，且是以行动者的互动能力为基础。这与韦伯的观点相反——对他来说，利益不可能成为正当性信念的基础，也因而不可能是威权的根基。

在智利，这种行之有年的威权行使方式，往往会造成不稳定和脆弱的权力关系，而这会导致「强势威权」更常出现。人们相信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威权行使是有效的。韦伯的正当性理论中，威权的行使是以掩盖其背后涉及的力量为目的；而这种威权行使与之相反，反而会借由演讲、肢体语言等方式，强调威权行使人的强势。

这种独特的威权运作方式在历史上常见于垂直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阶层体系是僵化且自然不变的。这种模式与如今常见的新兴民主威权模式、正当性信念的威权模式都相距甚远。不过它仍然存在许多社会当中，且被认为是能确保人们服从的唯一方法。

基于前述的研究发现，我认为，依据社会现实之间的差异，以及其应对成员权力不均衡的方式，威权行使发展出了不同的模式。我们不该把这些威权模式视为偏离规范，而应将其视为在特定历史情境中的不同方案。在分析他们时，必须考量每个社会的结构因素、动态与社会逻辑。

> 互动且处境化的威权行使理论取径

我于上述呈现了正当性威权理论在两个面向中受到的局限，并在此呼吁：我们的威权理论，以及其

概念与方法论，是时候要更新了。经过一系列实证研究中的[发展与测试](#)，我提议从互动和关系取径出发。

首先，这种取径倾向将威权视为许多社会机制（如礼貌、文明、社交等）的其中之一，用于管理社会生活，并确保社会维持权力均衡。借此，我们能够摆脱过去社会理论中的二分法，其仅仅将威权视为整合机制，或是纯粹的支配工具。

其次，我们应破除阶层概念与阶层秩序间的紧密连结，不再将阶层视为具有持久性、永恒性与僵化性。这种理解方式，使我们难以在更具流动性、权力分配以横向为主、威权位置轮替更常见的社会中，理解权力均衡机制。与之相反，此一取径强调把阶层视为模糊、边界不明确，且动态。

第三，我们应该将视野从威权根基、服从理由、纯粹代表等领域上移开。在当今的社会，探讨威权的基础，以及人们如何基于规范性共识而行动，已经不足以解释威权。这套新取径的分析重点，将是威权如何被行使，并理解其在不同情境中如何交替、转变并展现多样性。

第四，不再如过去那样，借由韦伯的「理型」概念，将威权视为某种具有同值性的事物。这套取径将威权理解为具有特定结构和历史背景，是特定社会情境所发展出的最佳方案。在不同的历史时刻、社会领域（家庭、政治、工作等）、社会位置中，威权的行使都有不同的脉络。

总之，我们急需更新威权的理论工具。正如我的实证和理论研究所呈现，我们需要从以「正当性信念」为基础的方法，转向互动且处境化的威权理论取径，才能更好地解释，当今的社会行动者如何在不同社会中，面对权力不均衡的现象。■

來信寄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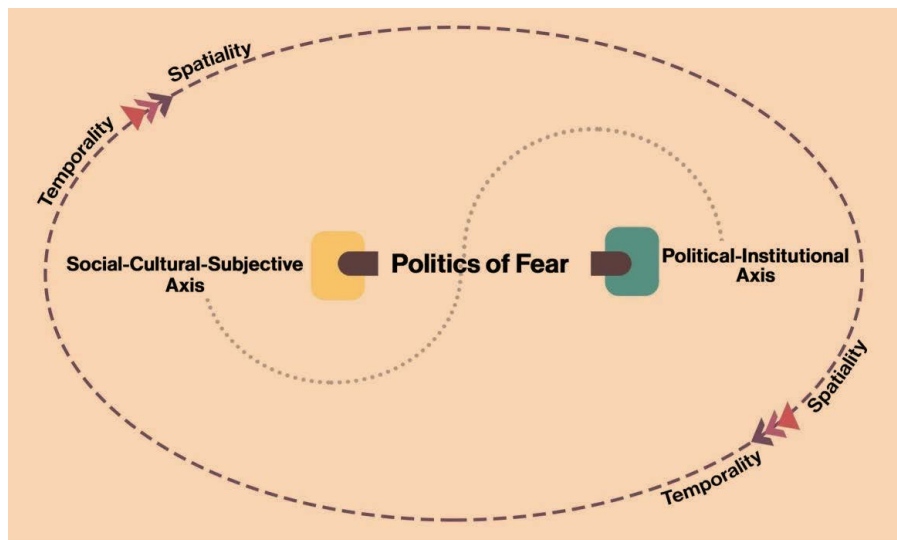
Kathya Araujo

<kathya.araujo@usach.cl>

/ Twitter: [@AraujoKathya](https://twitter.com/AraujoKathya)

> 「恐惧政治」与威权政治想像

Lara Sartorio Gonçalves · IESP-UERJ · Rio de Janeiro State University · 巴西



作者创作的图片，旨在说明恐惧政治的矛盾性质，其纠结于时间与空间的交混，促成了恐惧政治的另外两个重要面向：政治—制度与社会—文化—主体。

恐惧是过去十年中最经常被提及的词汇之一。我所指的是多重面向的恐惧，诸如：面对城市暴力(urban violence)的恐惧、面对身体遭受暴力对待的恐惧、面对国家暴力的恐惧、面对社会不公义的恐惧、面对未来的恐惧，甚至是面对存在的恐惧。在全球衰退紧迫袭来之际，人们的反应结合生存本能，使恐惧成为观察政治行为和社会连带结构的指标。我所说的「恐惧政治(politics of fear)」包含许多面向，不只是近期出现的现象(在全球崛起的极右翼及其将恐惧工具化中可以清楚见得)。以一个更全面的角度来看，我们正在目睹极右政治团体的能动性——例如我所研究的巴西博尔索纳主义(Bolsonarism)，也看到一种社会趋势，那是更能接受独裁政治想像和恐惧其稳定的社会历史存在。

> 在可见与不可见之间

我认为，应该要透过「裂隙实践(practice of fissures)」的观点，来理解恐惧政治。这套观点不会避免谈因不同元素而产生的变动、折叠与纠缠，且能够適切地关注那些不止于精神，也于肌肉、血液、脉搏中重复被言说、经验、累积的多重性。若是将恐惧政治图像化，那么它应该具有某种流动的、可变动的形状；组成恐惧政治的各个元素之间充满了孔隙，但又

不是完全分离。只有在人们试图分析、教学时，这个概念才会被切割开来理解。必须注意的是，即便是机构、个体、集体或是企业这类行动者，也未必会被视为是连续或单一的。广义来说，恐惧政治指的是一套有机或人造恐惧转化为社会凝聚力的机制，于现代政治中发挥重要功能。

恐惧的弥漫是一种政治效应，其不只作为构成社会纽带的动态媒介，也正当化了社会排除与仇恨。恐惧政治的矛盾修辞——例如记忆、美学、建筑、军事化的城市规划、基础设施及随之而成的社会深渊、数位化与加速的时间、边界经验和恐惧的地理位置、殖民和都市暴力——纠缠于时间、空间的交织之间。

恐惧的经验，会因权力的几何而异；这与构成恐惧和共同敌人矩阵的三元素有关，即种族、性别、阶级。举例来说，在巴西贫民区，国家会借警察之手施行暴力，而在都市中，军队则通常会带来某种安全感；因此，相较于都市，生活于前者这类地区的人，[对身穿制服者所怀抱的恐惧明显更大](#)。

恐惧政治的裂隙之中，存在着政治—制度以及社会—文化—主体两个轴心。前者对应着国家与文明间，以秩序／混乱的二元对立为基础的潜在殖民关系；其对「暴力的垄断(monopoly of violence)」以

及「国家保护社会的责任」等概念来说极为重要，左右着人们如何定义正当的、合理的权威，也决定了道德、世俗与政治企业家精神的意涵。后者则与前者处于同一时空，且两者的关系极为紧密；其是由推崇特定逻辑的认知与政治观点所构成，包括：危险他者的逻辑——这使得能够守护人民的国家成为必要，并促成了敌意政治与政治两极化等现象；数位化中监控技术的应用，以及某种限制自由的意愿；具有高度媒体再现性的、恐惧与暴力的美学生产。

呈现恐惧政治的概念轮廓，让我们得以更全面地反思极右派的崛起，以及民众对威权主义的追随。这套研究取径关注极右派如何出现、持续存在、其激进主义与追随者如何变动，并借此理解这些现象可能带来何种后果。我们应该将这些事件视作社会政治的里程碑，而不只是事件本身。反思公共生活与政治经验如何产生并调动特定事件带来的效应，将为社会的坚实提供有效支持。受 [Kathya Araujo](#) 的启发，我已经找出了一些锚定社会存在的基本元素，要理解极右思想的当代吸引力，这些元素极为关键。

> 威权主义的社会存在锚点

威权与其有效性之间的关系，被殖民地国家的集体想象所巩固，且是专制主义的同化基础。将他者转化为罪犯，是一种经常出现在历史上的动态过程，从国家的种族结构、以武力和暴力统治领土的手段、区分殖民和被殖民者的主观标记，就能观察到这点。从巴西的历史当中，我们可以明确地看到威权的有效性基础，是如何建立于镇压奴隶起义之上。我们必须得承认这种普遍的恐惧是社会关系的根本，才能够更好地思考当威权与威权主义如何以不同形式运作或潜藏于民主之下。威权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兼容性，更反映了威权实践的扩展如何普遍；我们能在生活的不同范畴——无论是最为个人、私密的，还是更宏观的社会关系——当中看见威权。

正如 Vladimir Safatle 所言，于自我与他者形象的建构过程，以及都市空间的领土动态中，恐惧发挥了殖民的效应，为都市中的分区带来更新。透过观察领土，我们可以知道社会安排如何进行。恐惧和空间是会相互影响的，这包含建筑、城市规划，以及「标籤化」「威胁」和「暴力」，并将其定位为次级群体。我们可以在有城墙的城市、封闭社区或军事化城市中看到这种空间效应。只有与殖民地对比，都市与其他空间之间的差异才会被看见，都市也才因此而是「都市」。正因如此，我们应该重视恐惧地理学的概念，将都市化的过程，理解成因为种族主义某种将危险「他者」视为罪犯的过程。

都市社会学学者曾以边缘国家为研究对象，并指出特定势力会透过媒体和日常对话强化不安全感，或夸大犯罪的实际情况。在军事化都市规划美学的主导下，都市中的围栏和墙壁变得更密集，这不只是为了安全或隔离，也考量了美学和阶层。由此可见，恐惧政治这套媒介，发挥了维系、加深社会不平等与都市暴力的作用，并很大程度地巩固了社会分裂。

另一个关键锚点，是恐惧政治用以诠释善（我们）恶（他们）的、柏拉图式的思想基础，这与道德、宗教信仰和理性之间的关系息息相关。上述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于宗教、国家与理性，不仅形塑着社会规范与制度，也引发了集体的反应与共感。「文明」和「驯化」过去经常被以较为正面的意义使用，然而如今妇女、被殖民者、受奴役的人（也就是「异类」），仍然更容易成为父权体制的直接目标。也难怪极右派的行动会被视为具有男性化、白人化、宣扬异性恋男子气概与军事暴力的倾向，这也反映在他们对所谓的「性别意识形态」的排斥上。妇女从被侷限在家庭里面，转变为佔据公共空间，确实在男性内心激起了某种存在主义的恐惧。

> 威权主义的想像与社会趋势

除此之外，个人化、数位化、紧迫感这三个当代独有的社会趋势，也成为了威权想像崛起的社会存在锚点。个人化指的，是现代个体的生活，很大程度是由对于陌生者的恐惧而驱动。如今，个体生活于一个令人不安的世界，于是需要透过各种方式，来避免自己被视作危险他者。换句话说，社会连结被经济结构层面的恐惧所支配了，而国家则作为威权，确保社会生活的稳固。「自我企业家精神」便是这项社会趋势最为极端的表现。

数位化的趋势，则是关于影像的影响力，如何于时间加速的现实中不断增强。这个趋势不只使得资讯得以大量流动；也促进了科技进步、连带影响了人们的互动方式与社会关系；更使得人们的注意力破碎化，限制了人在短时间内接收不同可能性的能力，并进一步地增强了影像于短短一瞬间能发挥的力量。同时，这些效应，也反过来协助了数位化这个趋势的存续。影像具有「象征功效(symbolic efficacy)」，意即带有内容，且能快速地在个人的意识中产生意义。影像的这些特质，与社会的数位化有极大的关系，而这对语言以及思想的传播，都带来了显着影响。借由散播一系列宣扬威权主义、种族主义、男性主义的影像，极右派得以扩张自身对于世界与社会的想像。

最后，在当代资本主义中，我们处于技术与时间加速成反比的矛盾中，这导致了持续的时间紧迫感，因为时间不够。尽管交通、通讯，特别是生产速度

>>

的提高表现出一种丰富的时间经济，但这一切却走向了时间的枯竭。现代性的加速意味着社会的不同步，个人总是感到自己迟到了，害怕错过机会。这种延迟感促进了极右派的两种战略，一是一切都是「最后通牒」：「我们必须采取行动，现在就必须行动」，没有时间去制定未来计划。第二则表明了机构及其设备的陈旧，这些机构在面对迅速流动的需求时表现缓慢。这些维度源于 Helmut Rosa 所反映的时间加速动态，影响了集体和个人对时空的理解。如果在社会结构的作用下，尽管个人愿望是相反的，但是时间紧迫感被强加，那么我们可以说这其中包含了代理的手段。

> 小结

恐惧贯穿了历史，形塑了人的主体性、持续地影响着语言结构，并改变了人际关系。恐惧的政策则被利用于合理化人际／团体之间／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威权实践。恐惧蔓延于社会的多个层面，其带来的各种影响相互维系着彼此的存续。应用恐惧的方式越来越多元，这样的政治效应，使得统治者意识到自身有更多支配、控制社会的手段，并拥有了操弄人们的主观认知与互动方式的能力。■

來信寄至：

Lara Gonçalves Sartorio

<larasartorio@iesp.uerj.br>

> 以水资源运动抵抗 新自由资本主义

Madelaine Moore · Bielefeld University · 德国



瓦拉甘巴大坝。来源：iStock, zetter, 2022。

小时候我生活在澳洲，那是在2000年左右。我非常清楚地记得，当时整个澳洲正处于早期，水资源缺乏的状况相当严重。尔后我虽然移居北欧，但过去十年里北欧地区多了许多地下水减少、干旱和河流枯竭等状况；当地居民讨论如何应对问题和对于状况忧心的程度，也变得越来越频繁。这样的情况，引起了我埋藏记忆多年却相当清晰的，面对澳洲干旱问题的担忧。在一些多为少数族群生活的区域，水资源往往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存在。人相当奇怪，只有面对水资源变得匮乏、河川不再流淌，又或者水受到严重污染而危害健康时，我们才会开始意识到水资源的重要性。并且，我们也才恍然大悟，原来水资源在全球政治经济中占了相当重要的调节作用。水资源的存在与缺席，不仅决定了我们的生活方式与居住地点，也决定了谁能够在这个世界上生存下去

> 发展以共同利益为核心的解决方案

人们与水的疏离、异化现象，并不是非常普遍的状况。事实上，许多原住民社区将水视为生命的一部分；水，在他们的世界观中是不能被商品化的。然而，对于那些无法取得干净饮用水的20多亿人口，以及生活在缺水环境的全球25%人口来说，水却不是如此理所当然的资源了。由此，全球关注水资源议题的

社会运动者正以「水即生命」的口号呼吁民众团结一致——我们应该将水资源视为一种共同利益，这件事正是成功应对当前生态危机的核心关怀。

我们目前正面临全球水资源危机，水资源及其相关服务，以及水资源相关的基础设施却持续被商品化、私有化、商业化，甚至日益趋向金融化。奇怪的是，上述情况竟被视为解除水资源危机的手段，而非造成问题恶化的根本原因。举例来说，最近召开的联合国水资源大会，这是50多年来首次专门讨论水资源问题的联合国会议。而其会议成果包括呼吁进一步动员私人企业填补资金缺口、鼓励跨国、水务公司和金融机构做出自愿承诺，并参与讨论如何将水资源管理与绿色金融（如今或许包括蓝色金融）和企业社会责任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然而遗憾的是，许多专注在水资源议题的社会运动者和非政府组织皆未受邀参与此会议。

> 谋生与谋利的拉扯：对水资源商品化的抵抗

我近期出版的书《[Water Struggles as Resistance to Neoliberal Capitalism: A Time of Reproductive Unrest](#)》，讨论全球水资源危机以及澳洲和爱尔兰的社区如何抵制水资源被商品化的扩张。我采用一种综合比较的研究方法，将与水资源相关的斗争视为一种载体，透过这个载体使特定时刻具有连贯性；其特征是经济、生态和社会再生产危机的并存，全球水资源危机则是其中的一个面向。

本书有两个核心重点：首先，我说明剥夺（水、自然和社会再生产）的行为在资本积累中扮演的关键角色；其次，我指出那些为了因应上述动态而出现的代理形式。除此之外，书中我也透过与爱尔兰对水费的抗议，以及澳洲抵制非常规天然气扩张的活动进行对话，并探讨生命与利润创造之间紧张的张力。也就是这两者间的紧张关系，决定了新的水商品领域。

我主要的论点是：每种对于水资源的剥夺行为，皆反映系统内不同却具相关性的面向，然而这整个系统却是在削弱人们谋生与展现生命力的能力。这两个

>>

案例中，水资源无论是作为社会再生产基础设施的一部分，抑或被用于其他建设，其都被重新构想成为资本积累的用途——水资源成为应对 2008 - 2010 年金融危机后的挑战。在澳洲，自然经常被比喻为「水龙头和水槽」，亦即，经济成长依赖对自然的持续剥削、征用。不幸地是，剥削状况不只发生在水资源，化石燃料、采矿和农业等其他资源一样深受其害。与此同时，爱尔兰的公共供水服务也成为重新平衡公共预算的手段，以用来弥补银行纾困后工人阶级社区所遭受的负面影响。

> 「球形修复」是无效的危机管理方法

本书的一个关键论点：透过将水资源作为资本积累手段，并无法解决潜在的经济危机。相反地，不断地剥削、征用自然资源，以及对于如何运用水资源的重新预想反而被转移成为使资本积累成为可能的条件，如：社会再生产、自然，以及数量增多的国家。由此，我借鉴 David Harvey 的「空间修复」(spatial fix) 概念，透过社会再生产理论对于目前水资源议题所面临的困境进行解读。我提出球形修复(spherical fix) 的概念，说明危机如何因政府的处理方式，不仅未被解决，反而被转移至社会中其他的弱势领域。例如：爱尔兰的经济危机看似得到「解决」，但是实际上却使工人阶级社区发生再生产危机；澳洲潜在的经济危机状况也看似被避免，然而经过政府加强开采化石燃料，将其用于出口后，却加剧生态危机，并耗尽依赖水景资源的农村之社会再生产力。这种球形修复的观点，凸显了资本积累制度是大量仰赖对自然资源的剥夺和社会再生产劳动的；因此，这即是解决当代全球水资源危机的关键。

然而，在每个案例中，只求资本积累的政治机构都必定走向不稳定或衰落。例如，那些将跨国资本的再生产，视为比农村和工人阶级社区更优先事项的国家。因为政治与经济利益的公开重叠，既导致了替代性的正式政治机会的减少，也致使那些在现状中被视为可有可无的人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更进一步地说，经济危机如今也以政治危机的形式出现。斗争过程中，出现了与以往情况不同的具颠覆性的理性经济；旧有的政治版图，更随着社区中新政治化的方式被重新配置。

> 社会斗争和阶级对立日趋严重的两个例子

澳洲的农村社区，他们正为了抵抗社会与自然的异化努力奋斗着。借由将水资源重新定义为集体财产而非私有财产，这件是说明了原先的异化其实是澳洲白人透过商品化水资源来殖民扩张的延伸。此外，将水和社区理解为共同组成要素，就必须将土地所有权问题与私有财产问题分开讨论；因此，在此我们提出了原住民土地被剥夺的问题，以及政府问题化无地主的土地这项问题。而这些社会运动中，出现了不同的以国家与以市场为主导的逻辑现象，也出现了以生态为基础的阶级对立情况。水资源被理解为一种有争议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阶级更被这些剥夺的过程所决定。

在爱尔兰，对于社会再生产基础设施的水资源之讨论，迅速演变为对其国家和相关机构(尤其是代议制民主制)的批判。水资源应该被视为社会再生产和相关基础设施的一部分，被理解为共同的、集体的权利；水资源不应成为使资本积累的目标。然而，这些主张凸显了国家对这项集体权利有限的责任能力：国家的物质限制意味着，即使水资源的权利在文书纸张上得到了进展，但在实际层面政府却也无法实现。爱尔兰及水资源问题被嵌入全球金融资本的循环中，即表明了它将继续成为实现工人阶级利益的阻碍。

> 颠覆性的经济理性空间：再生产的动盪

社会抗争的过程不只会出现暂时的结盟，同受到剥夺之苦的关系使社区之间和社区内部的团结得以可能。此外，爱尔兰和澳洲的社区都体现了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主要矛盾：谋利和谋生的条件，日益不兼容。透过与生态社会主义和社会再生产理论的对话来分析这些抗争，我们会发现，阶级抗争的舞台扩大到了家庭、自然和邻里之中。

将这些抗争置于全球水危机之中，并从矛盾点出发，我认为关于水资源的抗争既打断了资本主义再生产的进程，又为颠覆性的经济理性开闢了空间。在澳洲和爱尔兰，出现了一个再生产的动盪的时代。也正如我书中所展示的，全球水资源危机不仅涉及资源的取得或管理，更甚，问题的关键在于允许掠夺水资源和危机发生的社会关系和制度。■

來信寄至：

Madelaine Moore

<madelaine.moore@uni-bielefeld.de>

